

135713

井本館
日誌

反右派通訊選輯



510
/3187257

湖北人民出版社

510



統一書號:T3106•69
定價:(5)0.24元

反右派通訊選輯

•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1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frac{1}{32}$ 開·3 $\frac{9}{16}$ 印張·81,000字

1957年10月第 1 版

1957年11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6,001—17,000

統一書號：T 3105·52

編者的話

大鳴大放期間，武漢地區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借幫助黨整風為名，到處放火，向共產黨、向社會主義制度、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動了一場惡毒的進攻。在武漢地區黨委的領導下，各民主黨派、機關團體，和大专院校的廣大群眾，對這些牛鬼蛇神、魑魅魍魎展開了堅決的反擊。經過揭發事實說理辯論的群眾鬥爭，右派分子一個一個地被揪出來了。目前武漢地區的反右派鬥爭正向縱深發展，並已取得決定性勝利。這對於所有知識分子來說，是有深刻教育意義的。為了便於記取這一鬥爭的經驗教訓，我們特從報刊上剪輯一些寫法相近的有關通訊予以出版，有的經過作者作了較大的修改；雖然這些通訊所紀錄的，遠不是武漢地區反右派鬥爭的全部，也不一定就是寫得最好的。

編者1957年10月5日

目 录

章罗联盟驻武汉专员——馬哲民	1
一个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鋒	7
——揭开右派分子耿伯釗的假面具	
揭穿彭一湖的真面目	13
他們这样“帮助”党整风	20
——武汉大学在“鳴”“放”中的一些謬論	
“右派司令”吳开斌	30
韦、黃家族集团在华师的复辟勾当	36
揭开謎底	43
——中南財經学院的“联合宣言”真相大白	
阶級斗争的火焰	49
——华中工学院以會文三等为首的反党集团活动紀实	
“反官僚爭同济”是怎么一回事？	56
武昌商业学校里的风波	62
——反动分子陈恕是怎样制造学生鬧事事件的	
李蕤——披着作家外衣的个人野心家	68
姚雪垠的反党面目毕露	88
反党的“通才”	96
——記长江日报反党联盟的首腦楊江柱	
江云反党集团土崩瓦解紀实	104

章罗联盟駐武汉专員——馬哲民

一貫以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的民盟湖北省主委、中南財經学院院长馬哲民，这些天来，在广大群众反右派斗争的浪潮下，原形毕露。原来他是一个披着馬列主义外衣、站在资产阶级立場、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家。

他派人四出点火，要盟員“揭开党的黑幕”，
“把象鼻子說成竹筒都可以”

整风运动初期，馬哲民对光明日报記者說：要想真正鳴起来，首先要领导方面大胆地“放”，要讓大家“吐苦水”、“发牢騷”，这样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压抑和束縛。他还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特别是在肃反运动中，把人們搞得太苦了、太伤心了。为此，他首先派遣民盟省委机关的右派分子，到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去点火。在一次武汉市盟員大会上，馬哲民甚至說：“这次帮助党整风，什么都可以說，比如把象鼻子說成竹筒都可以。”馬哲民的亲信陆鳴秋，并冒用中共湖北省委統战部的名义，秘密地到华中工学院去点火。

当馬哲民派人到华中师范学院去搜集“肃反”和“工資改革”資料时，华师盟支部的一些干部不贊成背着学院党委来搜集材料。于是，他們便撇开这些靠攏党的盟員，自己动起手来。并再次派陆鳴秋到这个支部，号召全体盟員：“不要講什么观点立場，要揭开党的黑幕。”5月下旬，民盟湖北省委的右派分子，

并在汉口中山公园召开了一个由武汉师专教师参加的“黑会”，会后并派張云堯、李秋山到各校去推动組織这次“黑会”的經驗。

馬哲民还叫省民盟委員到各县去搜集工人、农民对党的意見；并要大家注意青年学生的活动。他說：“只有这些人动起来，才能‘鳴放’得起来……工人、学生起来，力量就大得很。”

他煽动学生到北京請愿。他說：“首先肯定成績是主要的，簡直是放狗屁”

身为中南財經学院院长馬哲民，抓住了青年学生年紀輕、缺乏經驗的弱点，明目張胆地煽动他們，企图利用他們作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儼然以学生利益的代表者，出席同學們的大、小會議，天天接見学生代表。当少数同学提出“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毕业生社会地位低、工資待遇低”的意見之后，馬哲民便趁机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演說，認為，这些意見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也沒有夸大事实”，他“完全支持”。他說：“中南財經学院問題太多，正处在紧急关头，大家提出这些意見是挽救了財院。”他还說：“过去我們的教學工作總結中，首先肯定成績是主要的，現在看起来簡直是放狗屁。”接着他煽动同学說：“你們的問題，学校能够解决的尽力解决；不能解决的，請示高教部；如果高教部解决不了，那么为了不貽誤你們的青春，你們要求离开財院、轉院我也同意；只要你們的問題解决了，我这个院长不当也可以。”

有些同学听了馬哲民这一席話之后，很泄气。只想關轉院。这时，馬哲民又一再向同學們表示，他“十分同情”青年人的“苦楚”，并說：“准备把同學們的意見轉給高教部，請他們派人来解决。如果他們不來人，我們就派代表团上北京。”在馬哲民的煽动下，同學們立即組織了一个代表团赴北京，出发前，馬哲民

又火上加油地說：“你們去鬧，沒問題。高教部的官僚主义很严重，要將他一軍。”

馬哲民并惡毒地誣蔑党的干部政策，进一步煽动学生对党不滿。他对农业經濟系的同學說：“你們的培养目标是明确的。目标是科长、場长等管理干部。但是，这些位子都被老干部占了。这些人业务不高，但都一定得当领导，除了领导之外，其他工作他們不能做。”他还說，目前党和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之間的矛盾，超越了党与高級知識分子的矛盾。他企图煽动工人、农民及青年学生与党鬧对立，动摇党的基础，从而把党搞垮。

他教唆以往擁護党的教授，要以“党所好惡之，党所惡好之”的态度“帮助党整风”

馬哲民煽动中南財經学院的教师們与党鬧对立。他积极鼓动过去在“三反”、“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被审查过的人“尽量吐苦水”。他对过去靠攏党的教授說：“你們这些人，平时是帮助党筑了牆的，总是党之所好好之，党之所惡惡之”，因此，在这次帮助党整风中，要“逆以往之道而行”。也就是采取“党所好惡之，党所惡好之”的态度。李光維教授曾反駁他說：“党所惡的是人民的敌人，难道也要我去好嗎？”

王祥麟教授（民盟支部主委）說：“有一次馬院长对我說，黨員干部是法西斯作风；‘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是教条。他想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自己却不說，而要我去提。我說，学校不要党委领导恐怕不对头。他立即板起面孔說：是你的思想沒搞通；党委制不取消，就无法說服党內的頑固派。”

他散布取消学校党委制的謠言，要求盟員 多提意見，“說服”黨員退出学校

馬哲民捏造事實誣蔑黨，把工作中的部分缺點擴大為全部；把個別黨員的錯誤，擴大為全黨的錯誤，企圖以此達到削弱黨的領導的目的。華中師範學院邵子風教授說：“有一次，在盟武漢市委常委會上，馬哲民公開說：老干部是‘堅持三大主義（指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熟讀四子書（抓辮子、扣帽子、擺架子、要面子）’；說‘老黨員都是經驗主義，新黨員是教條主義’，應付不瞭解放後的複雜局面。”去年，馬哲民以全國人民代表的身份，從四川視察回來，向中南財經學院教授王祥麟等說：“四川某大學有一個教授對我說：共產黨員是一些木頭人，思想簡單。這位教授不願入黨，不願與這些木頭人為伍。”

在一次民盟省委召開的“高校黨委制座談會”上，馬哲民派陸鳴秋代他宣布說：“中央已決定改變高校黨委制，只有少數黨員不肯退出，因此希望到會者對黨委制多提些意見，盡量揭露缺點，以便說服那些黨員。”經過討論，除了有兩三個人附有條件的贊成取消黨委制外，大多數到會者都反對取消黨委制。然而，馬哲民仍然說：“黨委制越來越阻礙了高等學校的發展。”在總結時，他故意歪曲與會者的意見，說大家認為“黨委制不能存在”。

早在去年夏天，他就開始推銷章伯鈞“兩院制”的主張

馬哲民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是有明確的資產階級政治綱領作指導的。6月12日，馬哲民對中南財經學院的教職員作報告時說：“今後人民內部的差別，是同一前進目標下的進步快、慢之分，沒有多大差別了。因此，我們不能把階級觀

念老放在脑子里不变。”他极力攻击人民民主政权的組織形式——民主集中制；积极支持章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要搞資产階級民主、搞“兩院制”。他說：“政协初期是一个权力机关，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就改变了。有人提出：政协应该对政府有监督权、应成为上議院的性質。我主張这样提。”（馬哲民1956年8月在廬山松門別墅的报告）他还說：“政协可能改为相当于資本主义国家上議院形式；人民代表会可能改成相当于下議院的形式。如此，就把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关系固定下来了。民主党派要自信起来，我們也要万岁了。”（1956年7月14日在民盟武汉市委基层干部座談会上报告）

于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馬哲民便指示武汉地区各大专学校中的民盟支部积极扩大組織。他說：“民盟是知識分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一只渡船。”馬哲民并派专职干部陈中正，到华中农学院去指示：“盟組織活动，可不必和党商量。”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与党分庭抗礼，馬哲民极力主張民盟在武汉市创办报纸，以扩大盟的影响。

他誣蔑“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論是教条主义，公开为章伯鈞、儲安平等辯护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論，对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猛烈回击的时候，馬哲民仗着平时伪装进步的假面具和两面派手法进行頑抗。他誣蔑“人民日报”社論是教条主义残余；說“人民日报”指出右派分子进行階級斗争不对。同时，公开为章伯鈞、儲安平、陈新桂等人的反动言論辯护說：“他們的观点是錯誤的，是不是立場問題，还不敢做結論。”他还說：“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想搞点資产階級民主。”他認為章乃器是落后一些，但反对章乃器的人也不一定进步。

他原来是一个革命叛徒，先叛党，又叛盟，至今还埋怨蒋介石不爭气。

馬哲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并不是偶然产生的。馬哲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在日本鬼混过两年回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便被党派到苏联去学习。1926年，北伐軍胜利到达武汉后，馬哲民回国。大革命失败后，馬哲民貪生怕死，不服从党所分配的工作，偷偷摸摸地带着眷屬跑到上海，加入了汪精卫等組織的中国国民党“改組派”，宣布“要左手打倒共产党、右手打倒蒋介石”。抗日战争时期，馬哲民在成都。当蔣管区民主运动高涨时期，他以进步面貌跑到重庆，参加了民主同盟。但是，由于他貪生怕死，他在重庆被捕后，馬上搖尾乞怜于張篤倫（伪重庆市长），并写信声明脱离民盟。为此，民盟中央要开除他的盟籍。因为章伯鈞竭力帮忙，才馬馬虎虎攔下来。抗日战争胜利后，張篤倫任伪湖北省主席，馬哲民又連忙跟他赶到湖北，通过張的关系，到湖北农学院当教授。馬哲民在解放后每每回忆起反动派对他的恩惠时，不由得牢騷滿腹，逢人便說：“蒋介石不好好地搞，不爭气。”从这里即可了解到：馬哲民为什么要反共、反社会主义了。

（原載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報”）

一个向共产党进攻的急先锋

——揭开右派分子耿伯钊的假面具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什么人在“帮助党整风”的幌子下，向党进攻最凶呢？看看耿伯钊的材料可以完满答复这个问题。

耿伯钊仇恨共产党切齿入骨

耿伯钊是民革湖北省委员会委员、政协湖北省副主席、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他自己则喜欢以“辛亥革命老人”自居。自从解放以来，在各种公开场合，耿伯钊用尽了动听的词句来说明自己是如何“拥护共产党”、“赞成社会主义”。但是，这次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他就大露头角了。一个月以前，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就提出反对所谓共产党的大党主义；他说，“这次提出的整风运动，据我的体会，也就是反对大党主义，不要党员人人以领导者自居，盛气凌人。建议毛主席把这話明确起来，这对党的威信有益无损”。

耿伯钊的所谓“大党主义”谬论，其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否认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争夺领导权。为了强调所谓“大党主义”，耿伯钊故意歪曲事实，把民主党派说成是“眉毛”，可有可无，发挥不了作用。也是在那次发言中，耿伯钊向共产党提出了10条建议，在这些含着毒素的建议中，耿伯钊“劝告”“党的领导同志要堵塞阿諛、逢

迎之門，黨員要从思想上根本鏟除特權思想和行為，不要騎在人民頭上”等等。在他的眼裡，凡是靠攏共產黨的都是阿諛逢迎。把共產黨員描寫成烏合之眾。

耿伯釗仇恨共產黨切齒入骨。他輕蔑地說：“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什麼特殊材料？還不是他們父母交合的血液製成的。”他說，共產黨員只不過是一群給人們帶來災禍的“蝗蟲”。耿伯釗把統戰部形容成是“監督民主人士的民主黨派管理部”，是“親小人，遠賢臣”的地方；凡是接近統戰部、靠攏黨的，他就謂之“小人”、“耳目”。他曾毫不隱諱地公開散布這樣的言論：“民主人士要有自尊心，不要靠攏共產黨”，他認為與中共統戰部接近的都是一些“卑鄙醜惡的壞蛋”。

耿伯釗挑撥人民群眾與黨的關係的方法更為惡毒，湖北省參事室研究員高元承揭露了耿伯釗的有關反動謬論。耿伯釗說過，“中國有六億人口，共產黨員只有一千多萬，分開打一架，看誰打得過誰”？這個拿着人民薪金而惡毒地誣蔑攻擊共產黨領導的“辛亥革命老人”，為什麼這樣刻骨痛恨共產黨呢？他有自己的道理。

耿伯釗對反革命罪魁的“恩情”戀戀不忘

耿伯釗是蔣介石的忠實信徒，他對蔣介石、白崇禧、何成浚這些反革命罪魁的“恩情”，至今戀戀不忘，提起這些人民公敵來，至今他仍恭敬地稱為“蔣先生”、“白先生”。省參事室研究員高元承揭露他說：1954年我到參事室時，耿伯釗知道我是山西人，就興奮地對我說：“我和你們山西的閻錫山是老相識，我和他都是日本士官生，回國後，他到山西，我到湖北，他搞的還象個樣！”對一個統治了山西40年的土皇帝，耿伯釗就是這樣地備加贊美。

耿伯釗的反動思想在每個政治運動中都充分地表現了出來，他對各項政治運動，在公開場合都表示熱烈擁護，背地裏却用盡心計來破壞，誣蔑運動。在“五反”運動中，武漢市五毒俱全的大資本家賀衡夫受到了應得的制裁，全市人民對此莫不表示擁護，耿伯釗卻心懷不滿，以至過後別人談起有關和平解放台灣的問題時，他還感慨系之地說：“在台灣比在大陸還好些。”土地改革時，耿伯釗盡力包庇國民黨大黨棍孔庚的兒子（此人現已被鎮壓），為農民訴苦的人被他說成是“拍共產黨的馬屁”，對於“三反”、“肅反”運動，表面上他都歌頌過，背後却惡毒地說，武漢市大資本家賀衡夫五毒罪行的證據都是假的，認為賀衡夫是受了冤枉。當人們正為肅反運動的成績拍手稱快時，耿伯釗卻露出了他凶狠的嘴臉：“等到台灣和平解放以後，連蔣介石也叫同志，現在又有什麼必要來肅反呢？”

耿伯釗希望蔣介石回來幹什麼？這點很有意思。耿伯釗說，他解放以來是含垢忍辱了五年。

耿伯釗含何垢，忍何辱

上面已經說過，解放以後，耿伯釗擔任了民革湖北省委員、省政協副主席、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主任等職位，他含了何垢，忍了何辱？原來是下面的這些事情：在參事室，耿伯釗雖然有職有權，5個副主任沒有一件事情不去請示他，但他認為自己是有職無權的傀儡；他自己有2棟房子，政府又另撥給他一棟房，他嫌屋裏沒有沙發，馬上給他送去沙發，可是他認為政府給他住的房子象倉庫；他每月的工資與房租收入在300元以上，喝的是好茶葉，吸的是高級煙，他却到處訴苦，說自己的生活是“上午炒鹽菜，下午鹽炒菜，吃豆腐是打牙祭”。最後還有一條，是解放後在廣大人民要求下，人

民政府依法鎮壓了他那當過大漢奸和國民黨軍統特務的儿子，他認為殺子之仇不能忘。

耿伯釗在解放後雖然得到人民的寬大、照顧，但他仍感到解放後含垢忍辱，是和他過去的生活比較而言的。解放前，耿伯釗是湖北省革命根據地安陸縣最大的惡霸地主，農民稱他為“土皇帝”、“太上皇”，全县28萬人口的生命財產完全操縱在他手裡，每次調換縣長必須經過耿伯釗的最後同意，他批准縣長的標準是：反共、反人民的積極分子。為了坐穩這個土皇帝，在安陸縣，他曾千方百計地破壞革命運動，企圖長期保持其地主政權。他驅使偽安陸縣縣長胡受謙殘害了幾百名革命志士，胡受謙在解放軍大軍南下時畏罪自殺，耿伯釗專為他召開追悼會，痛哭流涕地歌頌他“對黨國忠誠”，並且聲言要把他的“英勇事跡”呈報“胡長官”（胡宗南），為了替胡匪“報仇雪恥”，他又親率當時逃亡在武漢的地主、土匪、惡霸和劣紳到偽湖北省政府和武漢行轅請願，要求派飛機、匪軍、發錢糧彈藥支援繼任偽縣長孔欽勛回據安陸。這批耿伯釗的爪牙回安陸縣後說：我們如果再不好好的為胡縣長報仇，就對不起耿老。

解放後，他的土皇帝作不成了，他的土地被分了，漢奸特務儿子被鎮壓了。為了恢復他的土皇帝美夢，解放後耿伯釗心裏念念不忘蔣介石，行動中則仍然繼續充當劊子手喝采人，包庇反革命分子。曾經在安陸縣殺害革命同志幾十個人的縣國民黨部書記長廖尚質（監如），1950年潛進武漢市後，暗中組織地下軍，策謀反革命暴亂。耿伯釗對於這樣一個人民的罪人，多方設法加以包庇、隱瞞，幫助他找工作，指使他逃往外省。據安陸人民的檢舉，解放後，耿伯釗掩護了11個反革命分子逃亡海外，耿伯釗並要他們“努力為蔣介石的黨國效勞”。而在最近整風運動開始後，各處右派分子蠢起，耿伯釗高興極了，他

認為打倒共产党恢复“土皇帝”的时机已到，于是向党进攻的毒箭一支接着一支地射出来了。

耿伯釗的算盘完全打錯了

但是，耿伯釗这老奸巨滑的右派分子把算盘打錯了，当他剛把自己的毒箭放出不久，馬上就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击，人民憤怒地揭露了这个慣用两面手法哄騙人民的右派分子的历史真面貌。自居为“辛亥革命老人”的耿伯釗原来有着如下一段历史：1903年，他由秀才而中举，随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个“洋举人”回国后，就在清人果清阿手下，做了一名軍事故官，不久北伐軍起，他又混在黄克强部下当了几天參謀，这便是他“辛亥老人”銜头的由来。从1914年到1925年，他搖身一变而为北洋軍閥的爪牙，在北京作“京官”。这个政治上的不倒翁，从袁世凱潜窃总統以后，又改任陸軍部秘書长。自此，他便成了所謂“元老”、官僚軍閥的幕后人。当蔣介石背叛大革命，篡夺国权組織伪南京政府时，耿伯釗又登上了政府參軍长的高位，蔣介石做了伪总統，他也跟着高升为国大代表，在蔣介石60岁时，他写了一篇寿序，吹捧这个卖国辱民的强盜是“五千年来最偉大的人物”。解放后，他不得不假惺惺地投靠到人民政权这边，以便待机再起。

这就是右派分子耿伯釗为什么向共产党积极进攻的原因。他的丑恶行徑已激怒了湖北省和武汉市广大人民，現正紛紛痛斥这个右派分子。最近召开的安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們一致要求向这个右派分子講理。但是耿伯釗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还躲躲閃閃，不肯对其他的右派活动进行很好的交代，一味支吾搪塞，避重就輕，把自己的反动言論归諸于修辞上的夸張，引起了人民的更大的憤怒，他們表示一定要和右派分子耿伯釗

战斗到底。他们警告耿伯钊不准蒙混过关，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只有如此，才是光明之途。

(原载1957年7月16日“长江日报”)

揭穿彭一湖的真面目

近来，有些人在叫“农民生活苦”。右派分子也抓住这个题目来做文章。昨天的地主阶级分子，今天也在为农民叫起屈来了。说来似乎奇怪，事情却也真有。在武汉的彭一湖，就是这样的人。

为了弄清楚彭一湖究竟是怎样的人，他究竟是代表什么人说话，记者最近特地到彭一湖的故乡——湖南岳阳黄田，作了一次访问和调查。

下面就是从彭一湖的家乡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是从前彭一湖的佃户、债户、雇工等揭露出来的彭一湖的真正面目。

地主、债主、官僚

八年前，彭一湖还是黄田的地主老爷。

他曾经当过蒋介石反动政权下面的模范县长，靠剥削人民血汗的钱，在黄田这个山区占住了一百多亩肥沃的良田，成了当地最有势力的三大地主之一。

和其他地主一样，彭一湖的佃户遭受的地租剥削是很残酷的。贫农汤万城租了一年收谷十五、六担的土地，一年就要缴10担的租。这样，彭一湖一年收的租谷就有几百担，农民整年的辛勤劳动，只落得饥饿、呻吟，并且随时都有受到夺佃的危险。

彭一湖还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大东家。

他通过他的老婆和媳妇放債，此外还有五个人是替彭一湖放債的二东家，黄田几十户人家都是彭家的債戶。貧农湯定南曾向彭家借了18块銀元，利息是4个月1个对本，他被逼得8个月就卖掉了柴山，第二年又卖掉了水田，第三年只得将房屋作抵押，这样18块銀元还了100多元，还是还不清，最后妻子逼得去作女仆，儿子流浪在外作长工，弄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有一年，新谷上市，谷价猛跌，彭一湖的儿子彭肖臣用2块銀元1担谷的低价大量买进；而到了来年春天，农民又不得不用12块銀元1担的价格买进，就这样一出一进，农民受到了双重剝削，彭一湖家里却大发了橫財。

彭一湖在地方上是大多紳，彭的外甥是县参議員，他的儿子当过伪保长，依靠着这种政治上的势力享有着特权。彭家是乡政府的“直屬戶”。国民党的苛捐杂稅，是由穷人负担的，抽壮丁也是抽穷人家的子弟，彭家是“免征戶”。总之，层层的压迫和負担都加在农民头上，而彭一湖則是当地农民的統治主。

据农民說，在彭一湖家里，穷人連討飯的自由都沒有，有一年，70多岁的寡妇麦娘馳到彭家討飯，彭家認為她不該常来要飯，娘馳痛苦的說：“肚子餓，没办法，不来不行啊！”彭家認為她不該強嘴，抓住毒打，一直打得遍地乱滾，最后連走都走不得，一路爬回去。农民們反映，过去到彭一湖家里去的农民有四桩事：交租、借錢、卖谷买谷、出了事請他調解。平时誰也不敢去，农民如果去坐了一下凳子，彭一湖老婆就要佣人拿水冲。他的老婆到农民家去有事的話，为了怕沾上了泥巴，跨門坎都是一跃而过的。請看，农民和地主的地位，是多么悬殊啊！

可是，解放以后彭一湖却一再为农民叫苦，装着那样关心

农民。那么，听听彭一湖家乡的农民的声音吧：既然你这样关心农民，为什么那时不发发善心？为什么在你家干了10多年雇工的龔德才还欠你家的10担谷呢？为什么你的堂兄在外讨饭你却不管呢？

彭一湖：原来你是猫子哭老鼠，别有用心！

抵抗、破坏土地改革

1949年，湖南解放了。

彭一湖知道解放后要进行土地改革，于是借口“秋征太重”，赶忙在1950年卖掉了42亩土地，农民形容说：“彭一湖就象一只落汤鸡，慌慌张张的不管钱多钱少，出钱就卖，这样，他实得了160担谷。”可是，彭一湖是不甘心农民分得土地的，农民们只要回忆到这一点，都失悔自己上了一个大当。

1950年湖南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进行土改，彭一湖（当时他以民主人士代表出席会议）在会议休息时和贫农龔文秋说：“现在就进行土改太早了，你们一无耕畜，二无农具，三无种籽，土地分给你们岂不要荒蕪了吗？这会影晌生产。”他还主张：“现在减租就可以了，土改要推迟三年，等你们恢复了元气再说。”这是彭一湖使的退兵计，假如真是推迟三年，彭一湖一定会把田卖得一千二净，那时他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说：“改吧！改吧！反正我的钱已经卖到了手。”然而人民是不会上当的，历史的车轮是不会扭转方向的。

土地改革正在紧张地进行，千千万万的农民起来对昨天还压在他們头上的地主进行了正义的斗争，可是彭一湖却大叫“斗不得，斗不得”。他认为“农民斗地主是不道德的，是损伤了人的尊严”。他举例说：“在香港，买只鸡倒着提都是不道德的。”在他看来，共产党倒比英帝国主义都不如了。彭一湖的真正主张就

是“和平土改”，請看彭一湖的地主階級立場多么堅定啊！

彭一湖不但行動上反對土改、言論上為地主辯護，還從組織上掩蔽地主階級退却。根據農民的揭露，在土改中彭一湖隱藏了一個殺過許多共產黨員的兇手、國民黨鍾共義勇隊隊長、地主惡霸的分子，並且替他介紹了工作；另一個是他的外甥、岳陽的大地主，也是由他介紹工作的。

攻擊誣蔑黨的糧食政策

土改後，農民是站起來了，於是彭一湖就改變了他的策略，替農民叫苦，攻擊黨的糧食政策。

1954年，國家實行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廣大的貧農、下中農是積極擁護的，他們認為糧食統購統銷有三大好處：穩定物價，保證了供應，推動了合作化。但由於1954年碰到全國性的災荒，糧食工作又沒有經驗，工作上存在着一些缺點，有的地方出現了糧食緊張的現象，於是彭一湖就鑽空子大肆攻擊，並以民建中央委員的身份寫信給中央，批評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搞壞了，說“農村留糧太少了，一個農民只留糧460斤，連一半都不夠。”並且捏造事實說“人民吃不飽，體力不足，情緒低落，生產下降”，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形容得一團漆黑，企圖從根本上否定關係整個國計民生的糧食政策。

彭一湖認為一個勞動農民一年應該留糧700斤。可是，事實是怎樣的呢？

彭一湖說的人民吃不飽的情況有沒有呢？有的，那是什麼時代呢？那就是彭一湖當地主的時代。那時，許多農民沒有飯吃，只得吃野菜，吃苣（苕）藤，吃蕨根，稍有災荒即大量的外出討飯，彭一湖故鄉的農民有句俗話是“有菜半年糧，無菜半年荒”來形容過去的狀況，可是自從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以後，就

在1954年发生水灾的那年，黃田乡却没有一个人讨饭，没有一个人饿死，难道这不是鲜明的事实嗎？

彭一湖說人民吃不飽、体力不足、影响了生产，这是漫天大謊，黃田社去年增产几万斤粮食，由于国家实行了增产不增購的政策，全社平均口粮是520斤，今年許多农民都有节余，难道这不是鲜明的事实嗎？

彭一湖說留粮460斤連一半都不够，認為一个劳动农民起碼應該留700斤。这完全是坐在办公室里的胡思乱想，就拿彭一湖家乡來說吧，这个乡平均每人只有地1.62亩，1954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人只有615斤，如果按照彭一湖的留粮标准，国家不但不能实行統購，而且應該拿粮食出来了。誰都知道，粮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广大的城市人民也不能喝西北风。彭一湖說这样的話，目的究竟何在呢？

那么，現在农村的留粮够不够吃呢？記者曾訪問了彭一湖在农村的儿子，他是一个身体魁梧的大汉，全家夫妻两个劳动力，他說：“我們两口人，每天要吃升把米，两升苕（苕）絲，一年只要500多斤粮就够了，去年我們种了3亩多田，收谷2200斤，除交公粮、統購以外，还有1400多斤，我們还有苕絲400斤，麦子三、四十斤，油菜籽20多斤，黃豆、綠豆100多斤，泥豆8斗，今年喂了2头猪，不但够吃，还有节余。”談到一般留粮标准，他說：“如果大、小口把主杂粮搭配吃，400多斤就足够了。”當我們問及粮食統購統銷的情况时，他說：“現在群众比解放前生活要好多了，他們过去吃野草、苕藤，农民渠鴻谷解放前就吃过，去年就不同了，还喊我帮他做了約4斗米的糯米糍粑。”这真是天大的不幸，彭一湖嫡嫡亲亲的儿子用事实打了他老子一个耳光。

原来，彭一湖是以地主阶级的立場代表一部分反对粮食統

購統銷政策的富农，和少数富裕中农在攻击党的粮食政策。

不仅如此，彭一湖还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粮食統購統銷政策。

就在今年6月底，黃田合作社社委龔迪湘路过武汉时，彭一湖就同他大談其留粮标准，最后，彭一湖問他：“如果取消統購統銷，你看行不行？”“不行，取消不得。”龔迪湘的回答是很明白的。

打击基层干部

彭一湖在攻击粮食統購統銷政策时，把区、乡干部說得一錢不值，視若仇敌，他說：“区、乡干部的工作作风都很不好，……遇事都用强迫命令……农民对干部的感情非常恶劣。”他还說党召开积极分子會議是“秘密會議”，使用种种“阴谋詭計”来貫徹党的政策。

这完全是毀謗。

可以毫不隱諱，我們有些干部的工作作风是有缺点的，群众是有意見的，但絕大多数是党的好干部，是人民拥护的。党总支書記姚国輝、龔文秋、还有社长、社委，他們过去都是受过压迫剝削的貧农，他們从群众中生长，他們經過斗争的鍛炼，他們是人民推举出来的。群众認為他們是自己的财富，农民亲切的贊揚他們是肯吃苦、脾气好、关心群众，有事和群众商量的好干部，是党教育的好干部。

他們关心群众的疾苦，五十多岁的組織委員賀渭清情愿自己受冻，把自己的棉絮送給貧农，群众亲热的称他为賀爹，如果他下农村，群众拉着、拖着，亲热地宰鷄以款待，为了避免浪费，他办完事总是悄悄的走了。这是什么关系呢？是“恶劣”，还是骨肉之情！

他們会治理生活，不但貫徹了党的政策，关心群众，就是

彭一湖从前以抽鴉片、賭博著称的儿子，如今也被他們教育的象一个人，在工作，在生活。当然，他們对地主的确是有些“强迫命令”和“感情非常恶劣”的。但是，他們对农民却是很好的，农民也把他們当自己人看待。

农民認為好的，彭一湖就認為坏，农民認為是財富的，彭一湖却認為是一錢不值。立場是如此分明，原来彭一湖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看問題的。

留恋地主階級的努力

农民日子过好了，彭一湖是不甘心的。土改后不久，他儿子甚至仗勢（認為他父亲在汉口作官），将分給貧农龔延华的一部分财产夺了回去，去年，彭一湖以“作紀念”为名托人将分給貧农万毕玉的一个磁盆換回去了。农民們質問：过去土地是你的，房屋是你的，你是不是也要作紀念呢？

一系列的事实証明：彭一湖并不是农民的“福神爷”，而是一貫站在地主階級立場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彭一湖的原形毕露了，难怪52岁的辰嬭說：“当心，农民要是听了彭一湖的話，就会重新打入十八层地獄，永世不能翻身。”广大的农民則异口同声的說：“他这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們坚决的站穩立場，給他以迎头痛击。”

这值得彭一湖深刻反省，广大的人民更可以辨清是非，和彭一湖的思想划清界限。

（原載1957年7月6日“長江日報”）

他們这样“帮助”党整风

——武汉大学在“鳴”“放”中的一些謬論

武汉大学的党外师生員工在帮助党整风运动中，向中共武大党委会提出了許多善意的批評。这些善意的批評有很大一部分是正确的，其中虽然也包含着一些片面的偏激的部分。对于这些批評，中共武大党委書記刘真同志代表党委表示了态度，他說：“我們对这些善意的批評是抱欢迎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和有錯必改的态度。”有些应当馬上解决而且可以馬上解决的問題，如工資改革中有的黨員提級不尽合理；肃反运动中的遺留問題等等，已經着手解决了。

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們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却干着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勾当。他們对于党委工作的缺点和錯誤的批評，就不是那么实事求是，不是善意的批評，而是恶意的攻击。

程千帆要爭什么“主”

在这里，我們想首先提一提中文系程千帆教授。

程千帆是九三学社成員，也是湖北省政协委员。在大鳴大放中，他“总结”了过去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只起到了“裝飾品”的作用，因此，在一次會議上他提出民主党派在整风运动中“不仅要爭鳴，而且要爭主”。爭鳴，是可以理解的，“爭主”是什

么意思，程千帆在这次会上沒有講清楚。我們原来認為程千帆是拥护宪法的，因而也應該是拥护我們國家是共产党領導的。但程千帆在以后的一些“鳴”“放”中，使我們逐漸地了解到程千帆所要爭的“主”，原来是要爭奪領導權，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領導。

取消党委制还是好的嗎？

程千帆說：“上海有人提出要取消党委制，还是好的，他們想把工作搞好，不是想把工作搞坏。”（着重点是笔者加的，下同）他捏造了許多例子来誣蔑党、誣蔑党所領導下的國家工作，来証明取消党委制的意見是好的，在中文系“鳴”“放”会上他說在武汉大学要入共产党需要掌握“入党五术，即：一、三年不提意見；二、一切都体会領導意图；三、常跑人事处，接近当权派；四、多走一条門路；五、通过亲戚或夫妻关系”。在程千帆眼下，武大党组织不是按照党章规定接受党员的，党员也是学了这些法术鑽进党去的，自然不会做什么好事。所以程千帆認為“人事工作全是党员做，人事处、科成了独立王国，加上腐朽，变成了黑暗的王國。……他們犯了錯誤，別人无法監督，而他們可以随便处治人，使人身上加了暗影，食欲减退，工作不起勁”。程千帆对“三反”、思想改造运动更是深恶痛絕的，他說：“总說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績是主要的、偉大的，偉大个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說起思想改造就搖頭；什么成績是主要的，赶快收起吧！”他并且認為“历次运动”都“常常是捕风捉影，就去搜家”。

成績是主要的这个公式真的过时嗎？

正是程千帆这样“评价”我們的党、党员和党領導下的各項

工作是“腐朽”、“黑暗”、一团糟，所以，他不贊成我們說：我們的工作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这个“公式”，他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这个公式已經过时”了。

程千帆在5月底、6月初学校进入大鳴大放的高潮后，出現了許多反对共产党的領導、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論，有人积极在那里宣傳“資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要把整风运动改变成为向共产党“爭人权、爭民主”的运动。說是“共产党杀了我們几百万，我想杀他几十万”，“要把共产党連根拔掉”，有人到了工厂、下了农村企图煽动工人和农民搞大民主，程千帆是武汉大学政治学习委员会委員，是参与領導这次整风运动的人，当他看到了这个形势，看到了6月3日学生有发展到搞大民主的苗头，他盜了九三学社武大小組的名义，参加了武大各民主党派會議，协助粟寄滄起草并亲自修改了一个反党的“联合宣言”。在那个“联合宣言”中，主張把整风运动引向推翻共产党的領導的方向去。这个“联合宣言”发表的当天——6月4日，他又急急忙忙地参加了經他策划的学生报刊通訊聯絡站會議，他在会上煽动地說：“目前运动进展的很健康，与历次运动比，这次运动很正常，群众很理智也有节制。”他說，“同学们絲毫沒有錯”。他对党委沒有退出学校这一点很不滿意。說“某張大字报上写刘真同志（中共武大党委書記）是保守牌牙膏，这很对”。因而他号召学生“往解决矛盾的地方去”。虽然他沒有指明究竟往什么地方去“解决矛盾”，但从他主張取消党委制，說成績不是主要的，加上右派分子要搞大民主看，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他的这一系列的錯誤言行，在6月4日召开的武大学委会上受到了批評。有人指出他煽动学生鬧事的行为不对，他还得意地說：“現在讓他們鬧，等到真的鬧起来了，我出來說句話就可以解决的。”他已經很有把握地在等着要收拾殘局了。

“整风的炮手”反右派时却在放烟幕

前面談过，程千帆在大鳴大放中是个“炮手”，可是很奇怪，在“人民日报”的几个社論上，提出了批判右派思想言行之后，程千帆就由“炮手”轉向施放“烟幕”了。他积极地为右派分子辯护。他在一次会上发表了这样的談話：“群众在整风运动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現在我才明白，我們是做客的。这象主人出門，請客人看門，也好象請人炒菜。党請我們帮她洗臉，我們却全身都洗了，一直洗到脚，这当然不合规格。主人要你提三个主义，三个主义以外，你就不要多嘴，我們这些人在迷魂陣里积极地鑽了一个月，現在比較看清了自己的地位。”“現在有三条出路，一条是繼續帮助党洗臉，一条是将来帮助党整风，一条是自动退出，我現在还没有最后决定，将来是要自动退出的。”

程千帆的这番話是在反右派斗争刚开始时說的。尽管他說的那么隱晦，但是稍微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出：程千帆是在以“客人”自居的，他認為前一段多提了一点意見，“主人”（共产党）不滿意了，起来把“客人”当做右派斗争了，进行报复打击了，因而准备“最后退出”了。然而群众是有經驗的，程千帆这种战术叫做“以攻为守”，不过是在替右派分子作辯护而已。

粟寄滄要解决的根本問題是什么

我們还不得不提一下經濟系粟寄滄教授。粟寄滄在帮助党整风过程中，他的主要論点是恶毒的攻击共产党的領導。比如，他在5月23日省委统战部邀請的各民主党派第一次座談會議上說：“高等学校人事制度和人事工作必須改进。人事处，一般人都說是独立王国，是神秘的組織。”（見5月24日“湖北日报”）

他又說，“如果党群間真有一道牆，我想，人事处至少是牆的主要建筑者之一”。（同上）以后，他在校內、校外的几次发言中，一再无理攻击了人事部門。

人事处真是警察特务机构？

他在6月3日、4日中共武汉市委邀請的座談会上說，“人事处是一个神秘的独立王国，他掌握生、杀、予、夺之大权，掌握群众的政治生命……。”（6月5日“湖北日报”）在校內的发言中說，“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是宗派主义的大本营，是极端腐敗的行政机构”。

粟寄滄是根据什么說这番話，下这个結論呢？原来是“……人事处給我填一張人員审查单，送去，我一看，寥寥几行就有六个錯处。我大吃一惊，掌握我的政治命运的竟是这些人”。（5月24日“湖北日报”）人事处工作人員写錯了字，写錯了学校，的确是有缺点。但是因为这一点，是否就要提到“原則高度”，說是个“警察特务机构”？是“宗派主义的大本营”，“是牆的主要建筑者之一”，因而就必需要拆掉呢？

我們不相信粟寄滄不知道国民党的警察特务机构，是个制造黑名单，杀害进步人士的机构。因为粟寄滄是大学經濟系的教授，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人。粟寄滄又能够拿出什么事实，証明人事处（請注意，是高等学校的人事处）与警察特务机构有何相同之处。

原来，粟寄滄是要在党的“薄弱环节”先打开个缺口，好来进一步攻垮党对学校、对国家的领导作用。

共产党员是若有若无无所事事嗎？

5月14日武大民主党派座談会上，粟寄滄就說过：“武大的

黨員上自張勃川、張希光（一位是副校長，一位是黨委副書記兼人事處長），下至安先銀（通訊員），大多數是品質惡劣的。”說他所在的“經濟系的黨員有五大特點，一、自高自大，脫離群眾，二、自私自利，三、宗派情緒特別濃厚，四、特別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五、對系內事情包而不辦”。因此經濟系黨支部是“若有若無，若明若暗，無所事事”。按照粟寄滄的說法，武漢大學的大部分共產黨員，上自校長、黨委書記，下至通訊員，都是“品質惡劣”，基層組織由這些人組成，當然是象個燈影兒似的“若有若無，若明若暗”了，因此，他“很氣憤，學校里每個角落都是腐朽的，沒有生命的。”

我們不否認共產黨員也有缺點，但是試問粟寄滄有什麼材料證明武漢大學的大部分共產黨員都是品質惡劣？每個人都具有上述的“五大特點”？武漢大學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是哪個人用幾句話就可以“一棍子打死的”。那麼為什麼粟寄滄這樣仇視共產黨員，從根本上誣蔑黨的基層組織呢？粟寄滄說是“為了愛護黨，才提出這些意見”的，善良的人們，聽一聽，粟寄滄這種所謂愛護黨的聲音是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啊！

“肅反”是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嗎？

粟寄滄不僅攻擊共產黨組織和黨員，而且誣蔑黨的工作，6月3號在市委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上，他說共產黨“時時刻刻把舊知識分子看作是漏網的異己分子”，他說共產黨“殺人有兩種，一種是有形的，一種是無形的。……肅反對被鬥的人來說是後一種迫害”。粟寄滄這兩段話，如果站在人民群眾立場，是不可以理解的，因為從舊社會過來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今天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可缺少力量，有的經過長期鍛煉，

还成了共产党员，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肃反是对敌斗争，对敌人来说是谈不上什么迫害的。对于那些一向散播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言论，来路不清，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肃反中当然也要追查斗争，而粟寄滄妄說党把旧知识分子当异己分子，肃反是迫害，恰恰是代表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說話，不是很显然嗎？

起草和发布反党綱領

粟寄滄这种猖狂地向党进攻的行为，获得武大右派分子的掌声。武大各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就推举他为“民主党派”的召集人。6月3日在他家里召开的一次民主党派会上，他儼然以主席的身份，答应要起草一个武大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了。

他在这个“联合宣言”中极尽其造謠、誣蔑之能事。給中共武大党委按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如对那些故意誣蔑和攻击党的一切言行，一概說成是什么“为了帮助党整风”。說什么“群众已經揭露了不少的問題，有些甚至于是相当严重的違法乱紀的問題”。还說“要重視这些問題的严重性与广泛性”。如对党委退出学校，撤消副校长領導整风的职务等，都要党委“立即解决”。并且在“联合宣言”中写道：“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要对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加以研究和討論”。

粟寄滄再三提出要解决根本問題，在这个“联合宣言”中他没有說明根本問題是什么。可是有一次却露了馬脚。当法律系第一次“鳴”“放”大会上，姚梅鎮提出如今是“奴隶主統治”，要求取消这种統治时，他拍着姚梅鎮的肩膀說，“你們真的抓住了根本問題”。可見粟寄滄要解决的所謂“根本問題”，就是他要挂帅，要共产党下台，要从根本上取消現行的人民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

姚梅鎮副教授的“国家与法” 的理論怎样解釋

什么人在贊誉“天子”

我們还要提一下法律系姚梅鎮副教授。姚梅鎮在“应该懂得尊重人，尊重别人的劳动”(登在武大“学习简报”第二期)一文中說，历史上对旧时代开明一点的“天子”，曾有过“豁达大度，从諫如流”的贊誉。我們当然不能拿党来和封建皇朝的开明天子相比，但是党是不是也应该“豁达大度，从諫如流”呢？我以为是应该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又說，“……有些党员把敌我界限划得很狹隘，在他們的内心深处，似乎只有党是‘我’，党以外的都是‘敌’。有人反映武大党员与群众的关系似乎有点象統治者与被統治者的关系，这不是偶然的。”

姚梅鎮是不是認為，共产党已經回到封建皇朝那样的統治，因而就要取消现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呢？我們認為姚梅鎮說的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十天以后，他对他的論点又作了“發揮”。5月31日晚上七时，武大法律系在第一次鳴放大会上，姚梅鎮在“我現在作一个說明和揭发”的演說中說：“武大實質上是宗派主义，学校是宗派集团統治。不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宗派主义，不要把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了党专政。这种統治是奴隶主統治，是奴隶主专政……我們这些人是沒有带枷鎖的奴隶而已，受到非人的待遇，是活的奴隶。”他在“痛斥”宗派主义后說，“所以，我們現在是倒退了幾千年，”他还說，“現在的共产党比以前的封建帝王还可恶。”

什么人說共产党比封建帝王还可恶

不要忘了姚梅鎮是法律系的副教授，是教“国家与法”的老师，是法权理論专家。他是多么动听地在講“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統治的工具”啊！可是姚梅鎮为什么就不会用他講的理論去分析现在的实际問題呢？

中国封建帝王是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农民进行了殘酷的統治与剝削，使一个文明的古国长期处于十分落后的地位。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翻了身。把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特权和經濟上的封建剝削一起消灭了。农民再不是地主的奴隶，而成了国家的主人。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仅沒有了封建帝王的統治，并且把那些罪恶昭彰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加以法办，把他们送去劳动改造，使其成为新人。从某种形式上看，对这些人有点象“沒有带枷鎖的奴隶”。不过他们的大多数都在或是正在在劳动改造中成为新人，只有其中极其反动的分子，才說“共产党連封建皇朝的开明天子都不如”，才說“现在的共产党比以前封建帝王还可恶”。至于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看法了。我們不了解：作为青年老师的姚梅鎮，站在什么立場，发出这种的声音。并且要問姚梅鎮：你是站在什么立場？代表着誰？

到底代表誰

看来，姚梅鎮对于封建王朝的被消灭是十分惋惜，所以对共产党，对人民民主专政表现了十分的仇恨。

怪不得，当武大“鳴”“放”过程中，已經有人在大喊“胡风不是反革命”，要“爭人权，爭民主”，“我恨这个社会，我要用自己的行动使人相信資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的时候，在6月4日

的武大报刊联络站召开的会议上，姚梅镇还说，“这次运动发展的很健康，但不能说没有缺点。”其唯一的缺点那就是“领导上存在右倾思想”。因而他公然大呼：要用“肃反”的办法，使共产党人“停职反省”了。

所有这些，我们也用姚梅镇的话来说，“这不是偶然的”。

（原载1957年7月1日“湖北日报”）

“右派司令”吳开斌

原为一丘貉，不見亦傾心

4月中旬的某天下午，武汉大学一个学生在飯厅的信架上取下一封笔迹陌生的信件。信封上写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林寄”。和他同行的一个学生問：“是誰寄来的？”收信人也很困惑，是誰呢？他心里一动，答道：“是不是林希翎？”收信人激动而匆忙地撕开了信件，里面除了一本“文件”外，还附有一封字迹潦草的信：

“开斌同志：

……我于一个偶然的機會听人談起武大有你这么一个学生，你的許多見解和我是一致的，因此我很想認識你，故冒失地寄給你这封信，并寄上一本我的控訴書……我自己不是正統派、御用文人，而是激进分子……这个学期我就要毕业了，毕业后我想去当一名律師或記者。 林希翎”

附笔說：“来信請寄北京西郊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級。希望你来信詳細地談談你自己。”

是的，这封信果然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害群之馬”——北京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程海果）写的。而收信人，是武大中文系三年級學生，組織“火焰報”、領導武大學生中的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被武大同學稱做“右派司令”的吳开斌。吳开斌当天晚上就写了回信，以后，他們之間就发生了頻繁的通訊

联系，互相介绍自己的思想、观点、出身、历史，互寄照片，互通情况。林希翎还把她偷来的秘密文件和一些反动刊物寄给吴开斌看，吴也向林汇报武大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吴开斌对他的朋友说：“林希翎是女同志中间的英雄，只要想到现在北京的林，我就有了力量。”

这两个从未见过一面的“志同道合”的右派分子，就这样一拍即合，成了“天涯知己”，“相见恨晚”。最近，林希翎还有信来，和吴开斌订攻守同盟。

事非偶然

吴开斌能够被林希翎所赏识，成为坚决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是决非偶然的。他原来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官吏的家庭，从小就想“出人头地”，“自命不凡”，想当“大人物”，崇拜蒋介石；后来，受了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的影响，又非常向往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可是，他的“伟大抱负”还未实现，全国就解放，他的幻想也破灭了。他从阶级感情上感觉到新社会没有他施展“抱负”的余地，“早上一杯牛奶、咖啡真过瘾”的少爷时代过去了，共产党是他的“对头”人。所以，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坚决主张“一切党团退出学校”，想方设法去打击团在学校里的威信，带头反对军事代表。等到他父亲因为拒不交代反动历史和贪污煤油被捕，病死狱中后，他对革命更仇视，感到自己前途“暗淡无光”。后来他离开学校投入了长沙新华书店。但是，“以全国或全世界英才相比美”。目空一切的吴开斌，不久就发觉那里又非他理想的“出头”之地，而感到“没有想到竟落到这步田地”，于是工作消极起来，“一杯茶，看看报，盖章拿钱”。因为工作消极和包庇贪污分子，他自己也有贪污嫌疑，三反中受到了同志们的批评，他对新华书店的领导就刻骨地仇

恨起来，背地里罵他們是“老爷”、“阿斗”、“狗头”，咬牙切齿。吴开斌就是怀着这样“不平”的心情，在1954年考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

“思欲席卷天下”

吴开斌的野心是很大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曠野远大，思欲席卷天下”，在长沙新华書店时他总不得“人緣”的境遇，使他深深地得了教訓。他到武大中文系以后，就极力装得老实，要求“进步”，并且申請入团。他曾給他一个“密友”的信中自供这时的策略說：“我在此极力改变旧作风，团結关系頗好，平常亦不多言，但必要之話仍不避免，如此，或能避免以前境遇。……因此，別人見我亦平易。”但是，对这个伪装的狐狸，中文系三年級的同学对他是有警惕的，这个自以为“別人見我亦平易”的人，在同学的眼中看来，却是“思想深沉、莫测高深”，“对生活冰冷”，“庸俗圓滑”的神秘人物。因此，大家是“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吴开斌的思想是“曠野远大”，善于窥測时机的，他在那里一步一步的“爭取人”，“团結人”，一点一点的散布他的反动思想观点，逐步扩大障地。对于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办法拉攏。首先，他看中了他气味相投，对党不满，自認为政治上不得志，在人面前又不随便暴露自己真实思想的姚中琦，把他看做密友。后来又罗致了个人自由主义极端严重、有反党情緒的李正宇。不久他发现方雨晴情緒消极悲观，从关心生活入手，把方雨晴也俘虏了。

思想放毒

吴开斌从他的阶级本能上，又发现情緒偏激，个人自由主义严重，向往极端民主，而又缺乏社会經驗的卢斯飞、刘业超

是很好的爭取對象。於是乘他們犯了錯誤、在團內受了批評、滿腹牢騷的時候，對他們表示“同情”，恭維他們的“才華”。在取得了對方的好感後，他對盧斯飛說：“你年紀輕、幼稚，不了解在我們這個社會，有棱角有才干的青年，埋沒的不只一個。”“在學校里有威信的不是黨團員，是有學問的人。”勸他們多讀“世說新語”，老莊哲學，學習“和光同塵”（“混世”之意），“吃吃喝喝，找個愛人結婚是首要的”。匈牙利事件以後，性情急躁偏激的劉業超想不通，去請教吳開斌。吳開斌說：“上帝給你的腦袋，是給你思考的。”劉業超問在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還有缺點？吳開斌陰險地暗示說：“你太年輕，看多了就好了”，“天下的烏鴉是一般黑。”吳開斌經常說：“要注意分清什麼是真社會主義，假社會主義，我們的社會已經非常危險，搞得不好就會垮台。”“黨的政策是英明的，但地方沒有很好執行。”使劉業超們覺得，要很好執行黨的政策，一定要反對武大的黨組織才行。吳開斌又以“獨立思想”，“敢作敢為”，“做一個有棱角的青年不做應聲蟲”為幌子，鼓勵他們去懷疑和反對馬列主義，發牢騷，不問政治，不滿現實，不受組織約束。從道德品質上向劉業超放毒：“所有的道德都是假的，道德不過是一個概念罷了，有名望的人都不受它的約束，不要太傻了。”而吳開斌本人，確實是一個欣羨資產階級的糜爛生活，和有夫之婦戀愛，到處追求女人，後悔晚生了好幾年沒有嘗過妓院的味道的“浪子”。在吳開斌的眼中，“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甚至對他最好的朋友也玩兩面派。當一次李正宇對吳開斌說姚中琦是“市僧”的時候，吳開斌卻說：“你今天才知道嗎？他就是‘高若納’（宋朝文人歐陽修筆下所刻畫的一個虛偽卑鄙的典型人物）。”

這樣，弄得原來生氣勃勃的劉業超，無端對現實不滿，對人生厭倦起來，失掉了生活的興趣。年紀輕輕的盧斯飛無病呻

吟，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以为自己“才华盖世”，“生不逢辰”，在这个“平凡的社会”里，他们这样的有“不平凡”的人没有施展之处。以为过去象作梦一样，自从遇到吴开斌，才有了自己的思想。那些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在他们看来，都是“教条主义者”，“木瓜脑袋”，“庸俗社会学”。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吴开斌们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决定“209号寝室里不许挂革命领袖象，要挂，可以把爱人的象挂起来”。

就是这样，吴开斌逐渐地把这些“小资产阶级”一个一个俘虏了过去。吴开斌居住的209号房间挂上“独立思考”的招牌，成了武大著名的“自由市场”，室内经常发表着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谈论着醇酒美人。今年元旦，他们甚至在大门上贴了“难得糊涂”的横联。从209号房间里，每天散发出大量资产阶级腐朽的尸臭，毒害着中三班同学的灵魂。邪气上升，正气下降。到后来，中三班的团支部要召开一个会议，选举一个团的干部，也千难万难。

一心以为鸿鹄将至

但是，吴开斌知道，时机不成熟，过早的发表意见，是于己不利的。他在写给一个密友的信上就说过：“自己要少发表意见，以群众意见为意见，这样纵使错了，与你关系不大”，所以，那一段时间他的真正的意见深藏不露，只是在少数他以为靠得住的人中间流传。但他随时也在窥测方向。所以等到匈牙利事件发生，今年4月份武大组织政治学习后，他就组织已被他俘虏的小集团内的人物，以“百家争鸣”“独立思考”作幌子，在讨论会上，大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谬论，后来哲学系和中文系三年级一起讨论，他又以“枪口一致对外”为号召，拖了中三大多数的学生跟着他们跑。

党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的決議后，右派分子向党展开了进攻，吳开斌以为时机已至，他估計形势說：“这次运动可以看出来，除非是思想非常僵化的人，都是会跟我們走的。”他每天到圖書館看“文汇报”、“光明日报”回来，就唉声叹气，說：“缺点怎么这样多啊！”“唉唉，真是天下老鴉一般黑！”他以为共产党站不住了。当他看見在武大时机成熟以后，立即站了出来，組織“火焰报”，自己当了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司令”。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最猖獗的时候，吳开斌的小娄罗李正宇得意洋洋地說：“先行者在最初总是少数，现在总算把他們教育过来了，大家都跟我們走了。”吳开斌也得意忘形地說：“过去在联共党史上学了策略基础，总算沒有白学，这次得到充实了。”“鳴放才几天，从徐懋庸起培养的大小三害分子（按：他这里指的是党团员积极分子）連根拔掉，一齐倒台。”

算盘又打錯了

可是，这次吳开斌又估計錯了，共产党不但沒有垮下去，反而站得更穩了。經過这次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的障地也更坚强了。而吳开斌們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呢，却碰得头破血流，他数載辛苦經營的反党小集团，也土崩瓦解，连他最亲信的朋友姚中琦，也要与他“划清界限”，分道揚鑣了。

（原載1957年7月22日“长江日报”）

韦、黄家族集团在华师的复辟勾当

最近，华中师范学院揭露了以政治系教授韦卓民和教育科学教研室主任黄溥为首的家族集团的阴谋活动。

韦卓民、黄溥在解放前就是一对老搭档，在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华中大学中，韦卓民是校长，黄溥是副校长，为了巩固他们在“华大”的势力，他们是姻戚相联，壟断了“华大”的权力。与韦卓民有多年暧昧关系的戴惠琼的侄女戴琦琛（现任外文系教员）是韦卓民的儿媳（韦的儿子韦宝鏐是物理系副教授）；戴琦琛的哥哥戴世琛（化学系讲师）是黄溥的女婿（黄的女儿黄寄美任数学系教员）。华大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帝国主义分子被赶走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尽管给了他们以妥善的安排，但他们仍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当时曾扬言：“我们输了，他们赢了”。

当全国右派分子向党开始进攻的时候，他们认为是复辟的时机来了，韦卓民一马当先，指使着这个家族集团，在他们所在的六个系中（全校有九个系），在所在的民主党派中，进行点火煽动；这个集团的另一名首脑人物黄溥，则借游学之名，到京、津、沪、宁、杭等地院校，与右派集团取得联系和配合，在北京，曾和北师大的右派集团首脑张友松数次晤谈。

四支恶毒的暗箭

在这个学院内，他们主要从下列四点向党开火：

首先，他們企圖否認全院在歷次運動中的成績，特別是否定肅反和思想改造兩次運動的成績。韋卓民在多次鳴放中，一再用十二個字來估價歷次的運動，那十二個字是“叫人作偽、不負責任、好大喜功”，認為“思想改造是發動一批人來搞另外一批人”，戴惠琮和韋寶鏢隨即應合說：“思想改造是叫人作偽”，“思想改造我被整，原來整我的人更有問題”。這一支暗箭真是一箭雙雕，一方面，把黨領導學校的成績否定得一干二淨，另一方面，為自己帝國主義奴才面孔塗上了一層油彩。

其次，他們挑撥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韋卓民一口咬定“知識分子政策執行得很壞”，“黨脫離了知識分子”，“黨不了解也不願了解知識分子，老為他們戴頂帽子”。黃溥也說：“共產黨員現在成了統治階級，特殊人物，把知識分子當作毒草，好像舊知識分子挨不得”。

第三，否認學校幾年來的成就。把華大從一個舊的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堡壘，轉變成人民的大學，無論從教學質量、學校規模的發展、設備的增加上來對比，這都是舊華大遠遠想不到的成就，但這些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痛苦和嫉忌而已。韋卓民說：“幾年來把學校當軍隊辦，今天開會，明天開會，外行人辦學校是不行的，只談口號，不講本質，把學校搞得這個樣子真是可惜。”說學校沒有懂業務的人，“甚至連馬列主義的A、B、C也不懂”。

第四，是攻擊黨的組織。韋一黃集團在反宗派主義的幌子下，要把整個黨組織整垮。他們的所謂宗派集團，就是整個的黨組織。韋卓民認為學校中存在一個“以中原大學為骨幹形成的一個宗派集團”，而“三大主義的根源又是宗派主義”，“要把這個根源在整風中真正搞出來”。黃溥也在一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文章中喊道：“我們這裡有中原作風”。什麼是中原作風呢？當

然不是指行政領導而言，因为在59个系科主任中，原中原大学来的只19人，那只有是指黨組織而言了，原中原大学是老解放区的学校，而华大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障地，黨組織发展的不平衡这是很自然的，但韦卓民、黄溥却借此大肆煽动，說要改变这一状态，当这个学院风浪最險恶的时候，这些老狐狸公然向党委提出“建議”，要把中原的人調走一些，照他們看来，要平息這場风波是要黨組織退出去，讓他們来收拾“殘局”。

韦、黄家族傾巢而出

韦卓民不仅向党連施暗箭，而且还公开地亲自出馬四处点火。当学校一度陷于混乱的时候，这个平日深居簡出的老教授感到“春意闌珊关不住”，他到素无交情的老教授詹劍峰家去串門子，邀他一块出来“放”，他接見学生的訪問，并且由他过目发表了一篇充滿了煽动性的訪問記。在这篇訪問記中，除了重彈“肃反是叫人作伪”等老調外，还鼓励学生搞大民主，說“宪法上規定可以游行示威”，說“帮助黨整風我們是前奏曲，这是救黨救国的运动”，說“根除四害，人人有責，否則后生可畏”。在党委召开的座談会上，他說要“通过这次运动，天翻地复地翻出学校中的問題来帮助黨整風，好讓大家一起赶上时代！”

这个家族的虾兵蟹将，平常自命为“超政治的虔誠基督徒”、“洁身自好的貞节女士”、“高貴修养的‘尖特曼’”都傾巢而出了。学院內右派向党进攻的大事件，他們都“热烈支持”。

如“熊志成事件”，本来是一件普通的肃反案件，熊志成在肃反中，为推卸自己的責任，誣陷了几个好人，后經党委查証平了反，向被誣陷者道了歉。这一事件，右派分子却大加利用，他們一手导演了一出傀儡戏，要熊志成承認誣陷是党委授意的。这出戏排演好了之后，他們以为这一下可把黨攻垮了，組織了上

千人來听熊志成的含血噴人的演說。韦一黃集团的姦罗，黃溥的女婿戴世琛（化学系講師）認為这是給党的一記致命的打击，他打電話威胁院教工会，要給他們准备三輛汽車載人到南湖分部去听演說，听完之后亲自貼出“党委是黑良心”的標語，还热烈支持院本部学生組織熊志成来院部講演，并出主意要用鋼絲录音，企图把这个謊言到处散播。黃溥的爱人是个家庭妇女，也扭扭捏捏到老教授家中去东串西走，要他們都來听“講演”。韦卓民的儿子韦宝鏢积极活动“九三学社”，要把这一事件告到中央和人民代表大会上。黃溥的女婿戴世琛和他的丈母娘筹划着，要趁这机会为黃溥写張大字报攻上去。

在一个时期里，学院里民主党派的某些組織，曾經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基地，韦一黃集团看清了这一点，就把他們的家族分別打入各民主党派內。黃溥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华师支部的負責人，但他的女儿黃寄美却参加了民盟，而黃寄美的丈夫却是“九三”的成員；韦卓民的儿子韦宝鏢是九三学社的成員，而他的妻子戴琦琛和戴琦琛的姑母戴惠琼，多年来“不問政治”的人，却在鳴放高潮中，申請参加农工民主党；連平日坚持要保留无党派人士身份的韦卓民，忽然冒充起九三学社的成員。这些岂不是怪事么！显然，在他們看来，是变天的时候了，共产党要从学校中退出去了，掌握了民主党派，對他們的复辟統治，会有很大的好处。

死心塌地的一伙洋奴

这个家族集团是一伙什么人呢？原来他們是帝国主义温馴的奴仆，帝国主义被赶走以后，他們就自充为帝国主义在华大的看家狗。我們且来看看他們在解放前后的一段丑恶历史罢！从这里我們不难理解他們今天为什么这样瘋狂，也不难看出他

們要把華師改變成什麼樣子。

早在1942年，韋卓民就公開無耻地為帝國主義“征服中國”獻策，在他給倫敦會的信中寫道：“我的意見，是我們必須更集中我們的力量，在教育界中間作一些工作，若想贏得中國，必須贏得她的領袖，而她的領袖却常出於受教育的階級。”

解放前夕，韋卓民、黃溥不僅在舊華中大學貫徹帝國主義的指示，壓制進步的學生運動，而且他們倆還匆忙在長沙召集了華中區中等教會學校的校長會議，商討對待共產黨的策略，作出了如下的戰略決定，如“目前大局是基督教面臨的重要關頭，亦即教會學校和個人所遇到的人生挑戰”，“為應付當前的關頭，基督徒教職員不參加政治糾紛與階級鬥爭”。韋卓民、黃溥這伙人，就是抱着這樣抗拒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態度來“迎接”解放的。

解放後，他們千方百計地防止“共產主義勢力的滲入”，掩護學校的帝國主義分子，在這塊“小天地”中，帝國主義分子得以公然散布殖民者的理論，說西藏是英國的領土，杜魯門第四點計劃對中國的好處等，這就不得不引起愛國師生的憤慨，掀起了“反侮辱、反誹謗”運動。這時的韋卓民和黃溥，一方面破壞“兩反”運動，一方面率領全家老小，慰問帝國主義分子席珍珠，而當帝國主義分子滾回國的時候，這個家族集團的老老小小，扶老攜幼，哭哭啼啼的為她們“餞行”，說什麼“我們的身體雖然分開了，而精神卻在一起”。韋卓民還寫信給帝國主義分子表示自己的難過，說“可能的話，爭取他們再回來”。從這些活動里，我們不難看出，他們要與共產黨對抗的決心。

韋卓民、黃溥千方百計地看守着帝國主義這份家業是為什麼呢？他不僅是為了想讓帝國主義者得以卷土重來，而且為了繼續的麻醉中國人民。比如1950年，韋卓民參加了全國高等教

育會議，在他給帝国主义的报告中写道：“最近北京举行了高等教育會議上提出大学課程的統一和标准化，无论如何，唯一要适当指出的，我們并不希望严格地执行政府課程，而在一般的規定之內，要考虑到局部和个别的变更。”而韦卓民作了哪些变更呢？請看他講的“基督教基本信仰”中的一段話吧：“我們生活在黑暗和恐怖籠罩着的世界里，面临着人类千鈞一发的局面，基督徒唯有依靠上帝好去挽狂瀾于既倒，把人类从水深火热的恶势力中拯救出来。”无怪乎帝国主义分子对他的活动大加贊賞，說：“你能把你的講稿印成小冊子，我們觉得很高兴，基督教文学在这个时期，与广泛散布的其他宣傳作斗争是重要的事物之一。”

韦卓民一黃洩苦心孤詣地要在解放了的中国，把华中大学保持下来，为了什么？他們現在又瘋狂的想推翻党的领导，这又是为了什么？原来他們想回复到“华大”时代繼續为帝国主义主子效忠。

“梦”中露了原形

当他們在学院內到处放了火之后，以为这到处的烽烟，已經把党委燒得焦头烂額，該輪到他們来收拾殘局了，这样就可以自吹自擂的粉墨登場了。

韦卓民恬不知耻地掩藏起自己帝国主义奴才的老底，对党委說“自己解放前是不革命的，是超政治的”，对学生說“解放前我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在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談会上却又跨进了一大步，說自己“到延安去不成（好象是很想革命的样子——記者），只好站在超階級的立場”。难道他說这些話只想把自己装成清白无瑕的么？不是的，請听他三番两次的說：“我不是学教育行政的，我不想当院长”（这是“此地无銀三百两”），“我教了几十年書，只要在学校呆半天，就能看出学校中存在的問

題。”这种毛遂自荐的口吻，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么！

至于黄溥，因为不在家，是由他的老妻、女儿、女婿把他抬出来的，他（她）們联合給学生写信，說黄溥是“一个老教育家”、“中南区的名学者”，过去受到了排斥和压抑，不能施展才能；韦卓民也出面为他的老友爭爵位，說：“黄秋浦是学教育行政的，他有經驗”，言下之意，这个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主任，也該在这一次运动中升官发财了。

与韦卓民关系暧昧的戴惠琼，几年来不能开课，这一次用送一件衬衣的代价，托黄寄美代她写了一篇“现在我有机会鳴放了”的稿件，她要把自己的六級教授再往上提。

这个集团的其他成員，有的要升成几級教授，有的要担任什么职务。看来，他們認為又回复到爭权夺利的时候了。

无怪乎右派头子馬哲民指責民盟华师支部說：“你們不发展韦卓民，簡直是一种錯誤”，馬哲民的走卒艾璋生有几年和韦卓民沒有往来了，这一次也鬼鬼祟祟的私下约会，艾說要站起来，还要当四級教授（他是六級），和韦卓民素昧生平的高庆賜，也在利用“快报”主編职务替黄溥吹嘘，向韦卓民暗送秋波，与此同时，他还强硬的要求恢复自己教务长的职务。

或者这些“乱世英雄”們要求的还不止这些吧！

* * *

从現在看来，对右派分子来說，只不过是一场“春梦”，对我们来說，却在他們这场梦中看到了他們的原形，无怪乎韦卓民現在是又懊丧又悔恨。他說：“鳴和放使我太放任，太得意忘形了，說了許多不該說的話。”或者这是他一句由衷之言吧！不过，話又說回来，把这些肮脏东西拿出来，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比隱藏在阴暗的角落要好得多么！

（原載1957年7月31日“湖北日报”）

揭开謎底

——中南財經學院的“聯合宣言”真相大白

由一小撮右派分子發起的，企圖利用各民主黨派名義、向黨委施加壓力的“聯合宣言”，是中南財經學院右派分子反黨陰謀活動中的一件最為突出的事。這件事，在反右派鬥爭的浪潮下被揭發出來之後，引起了全校師生員工的極大憤怒和密切注意。

劉光華是“聯合宣言”的幕後策動人

“聯合宣言”的幕後策動人究竟是誰？這個問題象“謎”一樣，使大家追查了十幾天。原因是，參與這項活動的六個人，交代問題吞吞吐吐、互相掩飾、企圖蒙哄過關；無論在會議上、或個別交談中，總是別人指出一點，他們交代一點，直到鐵的事實擺出來之後，才一一承認。

6月5日，正值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之際，彭師勤（民建）、彭瑞夫（九三）、陳道良（九三）、侯厚吉（九三）、劉隆恕（民盟）等人，鬼鬼祟祟地聚集在劉光華教務長（民建武漢市委委員）家裏，就“鳴放”問題交換意見。劉光華劈頭就問：“民主黨派負責人，與黨委座談的結果怎樣？”彭師勤回答說：“黨委與‘群眾’的看法有距離……聽說武漢大學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起了作用。”這時，劉光華神氣活現地說：“我們也來一

个。”于是，他指示应以学习快报（院刊）上最“典型”、最“突出”的事，集中说明党委“是一个宗派”；并决定由彭瑞夫去指点在“鸣、放”运动中疯狂地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欧阳滌尘执笔起草。

欧阳滌尘接到这项任务后，于7月6日开了一个夜车，7日中午也未休息，赶出了一厚本，从肃反、人事安排、工资福利等三方面来诬蔑党委“是个宗派”的“联合宣言”。由彭师勤带到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席会上，企图趁其不备加以通过，利用各民主党派的名义公开提出。但是，刘光华、彭师勤等人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反对这种作法。方纘先教授（民盟）说：“我们民主党派对党委有意见应该当面提，何必要搞这个‘联合宣言’呢？”当时，彭师勤和彭瑞夫对大家很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会后彭瑞夫去请示刘光华：“各民主党派不通过，怎么办？”刘光华又指示：将“联合宣言”原稿，用国民经济史教研室几个教授和民建教授的名义，送“光明日报”发表。

右派分子企图利用“联合宣言” 向党委施加压力、要党委下台

刘光华等人，策划“联合宣言”的动机是非常恶毒的。但是，当事情被揭发出来之后，他们却不承认，硬说：“最初考虑写‘联合宣言’，是想整理一份系统的材料供党委参考。”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轻描淡写的狡辩。谢伯龄讲师说：“‘联合宣言’的性质是反党的，它由以下几点所决定：第一，‘联合宣言’的资料来源，被指定为‘快报’上最恶毒、最凶狠的关于‘双料宗派’主义一类的反党言论。第二，‘联合宣言’的执笔人，被指定为曾向党疯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欧阳滌尘。第三，‘联合宣言’的酝酿、

起草整个过程，是背着民主党派，在暗地里进行的，是采取‘乘其不意，出其不备’的袭击方式，向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席会提出的。”李光维教授说：“这个宣言，不过是右派分子阴谋活动的一个表现，背后还有他们整套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目的在于取消我院的党的领导。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提的六项标准，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

经过多次会议的分析 and 批驳，参与起草活动的彭瑞夫才承认：“策划‘联合宣言’时，并没有人说过给党委参考的话，而是企图利用民主党派通过后，拿去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其目的，是为了向党施加压力、至少也是想要同党平分秋色。”“联合宣言”执笔人——欧阳滌尘也承认：“他们要我起草时，并没有说过提供党委参考的话。我在‘鸣放’运动中，发表了許多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他们叫我起草，能写出什么善意的东西。”在这种无可辩驳的情况下，刘光华才承认：“草拟‘联合宣言’并非善意的，思想深处是想对党施加压力，因此在写的时候，总想把材料的分量和语气写得愈重愈好。”彭师勤也承认：“发起‘联合宣言’，是想利用民主党派名义，向党施加压力，强迫党委承认自己‘是个宗派’。”

刘光华企图窃取副院长职位

“联合宣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刘光华等人一贯对党不满的集中表现。

据彭瑞夫揭发：“刘光华远在1954年冬，就声言要控告党委，并给党委捏造了‘五大罪状’。在‘鸣放’运动中，刘光华还要我写匿名信给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央，我没有这样做。”吴澄华教授说：“刘光华和馬哲民一样，对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很感兴趣。他曾说，在‘鸣放’后，学校的人事要来个大变动——党员要下

橋、非党人士就好了。刘光华主張高等学校实行两院制（院、系兩級）取消教务长一級；其目的很明显：刘教务长当然不能下放当系主任、起碼当副院长；同时，馬哲民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也說要推荐刘光华当副院长。所以，他趁整风的机会，极力攻击、誣蔑党委，企图把党委从领导崗位上拉下来。他說：副院长（党委書記）是个傀儡；副教务长（党委副書記）有点學問，但很阴險；另一（党委副書記）嘻皮笑臉也不行；人事处长是个女工出身，連起碼的知識都沒有。”

張人价教授，被刘光华等人的这些无耻謾言激怒了，他說：“刘光华等，企图利用民主党派名义，强迫党委承認自己‘是个宗派’，以此讓党委下台、甚至把党委赶出財院，达到他們夺取学校領導权的欲望。这个目的是可耻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的領導者和保証，我們要保卫党、坚决击败右派分子企图迫使党委下台的阴谋。”

必須弄清大是大非

为了进一步明确“联合宣言”的反动目的和反动性質、弄清大是大非，中南財經学院全体师生員工2 000多人，于7月14日和17日两次集会，駁斥“联合宣言”中捏造事实、誣蔑党委“是个宗派”的荒謬言論。

刘光华等人，在“联合宣言”中，首先从人事安排方面歪曲事实，說党委的宗派主义，突出表现在“非党人士有职无权”上。罗洪佑講師，在14日的辯論会上，以自己亲身体会，批駁了这种歪曲事实的說法。他說：“我从1954年起，就当教研室副主任。我認为：职权問題，是看你如何理解、你要求什么权——在教育部門，唯一的大权，就是把教学搞好。在这一点上，党委把排課、教課、編講义等大权都交給我們了。我感到自己是有职

有权的，而且每个教师都有权。但是，刘光华等右派分子，他们却要个人发号施令的权——去年‘評級’时，刘光华要提彭瑞夫（刘的亲信）为四級教授，大家不通过，只給五級。刘光华便发牢騷，說我是教务长，提出一个意見竟被否認了；因而感到自己有权无权。”談到这里，罗洪佑講師以响亮的声音說：“我認为，刘光华所要的这一種权，党、行政和群众应当坚决不給。因为，他有了这个权，就会去搞小集团利益，这将会严重地影响教学工作。”

刘光华等人，在“联合宣言中”攻击“肃反工作”，說“肃反”是党委宗派主义的集中表现；并捏造事实，給中南財經学院党委定了三大“罪状”：說什么有计划地以莫須有的事实，斗争“肃反对象”，說什么非法剥夺被斗人的人身自由；說什么侮辱民主党派人士和教授的身份等等。谷远峰助教，对他们这种不顧事实的說法感到痛心，感到刘光华等人辜負了年輕一代对他们们的尊敬和信任。谷远峰助教沉痛地說：“反革命分子，是人类的渣滓。他們的手上，染滿了千千万万无辜人民和革命烈士的鮮血。他們用辣椒水、老虎凳、絞刑、电刑等等殘酷的手段，对待无辜的人民和革命志士。因此，如果我們也用这些东西来对待他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們还有什么話講呢？但是，工人階級和他的政党，是用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們知道自已的历史使命，是消灭階級、消灭剝削制度。他們不是为了一己的狹隘階級利益出发。因此，他們在旧社会里，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們不主張报复、不主張以暴易暴。相反的，他們把反革命看作是旧社会的产物，因此除了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处死外，并不消灭他們的肉体，也不在肉体上折磨他們。可見，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下，才能講人道、才能講仁政与寬大。”接着谷远峰助教質問刘光华

等人：“先生們，我們加于反革命分子头上的，远远沒有超过反动統治階級加于人民头上的千万分之一，而这又有什么可以使你們伸冤的呢？”

这时，刘光华等人被問得无言答对，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头低下去了。

（原載1957年7月22日“湖北日报”）

階級斗争的火焰

——华中工学院以曾文三等为首的反党集团活动纪实

华中工学院学生中一个全院性的右派反党集团，经过留校同学一个暑假的斗争、揭发和调查，现在已经露出了原形。这个集团是由几个右派学生小集团在向党进攻中形成起来的，总共有二十多人，分布在全院四个系。它的核心分子是曾文三、陈律恒、全克里、蔡哲成、李家明、王德化、陆皓长。这个集团的十二个核心和骨干分子，都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家庭，其中有八人肃反时被斗或被批判，有两人的父亲被斗。他们对过去这些政治运动心怀不满，对以往剥削家庭的生活则恋恋不忘，认为今不如昔，对党怀着刻骨的仇恨。由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曾文三，就经常对人說：他“对家庭的感情超出了对集体的感情，对家庭的热爱超出了对集体的热爱”。又說：“现在的生活是糟的，而原来的生活则是美的。”他参与了这个集团所掀起的两次反党高潮的全部活动，而且是許多重要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决策人，他、全克里、蔡哲成到了第二次反党高潮的时候，实际上已成为这个集团的首領。

这个集团的反党活动是有綱領、有組織、有策略、有計劃地进行的。他們提出了“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权”的政治口号，集中攻击肃反运动，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满，企图煽动同学罢課罢考，等到和党委会立于平等的地位后，进而提出条件，推翻

党的领导。他們先后掀起过两次反党高潮。在他們猖狂活动的日子里，喻家山真是烏云乱翻，黑白颠倒。

第一次反党高潮

这个学校5月中开始鳴放，5月下旬，这个集团进行了一連串的活动，掀起了第一次反党高潮。

一、“鳴放評論”、“民主刊”、“民主墙”的反党宣傳

首先，这个集团的李家明在这个学校的西边(西边有电力、动力两系，以下简称西边)組織了“鳴放評論”，曾文三、陈律恒在东边(东边有机械一、二两系)，組織了“民主刊”、“民主墙”。他們在組織报刊編委会时，就提出了一条反党的組織路綫。他們吸收的对象，首先是肃反中被斗争的人，其次是平日对党不滿的人。对党、团员則是排斥，曾文三說“有党员参加，就会变质”。

这些报刊，首先集中攻击肃反运动，发表了大量誣蔑肃反运动的文章，来迷惑沒有参加这一运动因而不了解真象的一、二年級同学。在这些文章中，把反省室形容成“法西斯集中营”，无中生有地說它“五步一哨，十步一崗”，深夜还傳出“凄惨的叫声”；把当时个别的打人現象加以夸大和普遍化，說是领导布置的；說肃反干部沒有“人性”，沒有“心肝”。“鳴放評論”登載的一文中这样煽动：“被摧殘的心灵，被破坏的友誼，难道道欺揭发一下就能解决问题嗎？不！差得远！”曾文三在“民主刊”上更写道：“……在我們这个黑暗的角落里，沒有什么正义，沒有什么真理，更沒有什么宪法……”，他号召大家“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权”，“沉睡的巨人站起来”，“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东方的太阳”。

二、組織“民主台”向党進攻

曾文三、陳律恆隨即又組織了“民主台”。他們物色了一批肅反被鬥、心懷不滿的分子，即他們所謂“老虎”到這個講台上來“控訴”。

“民主台”先後舉行過兩次，也就是說讓“老虎”出來“控訴”過兩次。第一次舉行過後，曾文三還布置這個集團的成員收集反映，並總結了經驗。他認為第一次只有一個人出來“控訴”，欺騙煽動的力量還不大，同時，聽眾只限於東邊一、二年級同學，沒有西邊的同学和學校教工參加，不能達到煽動全院同學、教工的目的。於是曾文三等便東西聯絡，組織聽眾，物色上台“控訴”的“老虎”，並動員了一個叛徒以“肅反幹部”的身份出來“証實”“老虎”們的“控訴”的“真實性”。當這一切準備工作完成之後，他們又舉行了第二次“民主台”。在這次出來“控訴”的“老虎”中，有個叫陳永源的，他在肅反之前就是一個駝背，而且有病。他在台上却捏造說他的駝背是在肅反中被打成的，而且他說兩句，咳一聲，喝一口水，裝得十分可憐。在旁邊還有一個右派分子給他做受刑的表情，火上加油地給他加上煽動性的注腳。

“民主台”在同學中，特別是不了解肅反真象的一、二年級同學中，散布了極壞的影響，挑起了他們對黨的嚴重不滿。當陳永源在台上“控訴”時，有的同學就當場哭了，有的當場給陳永源寫了慰問信。當一個右派分子提議把陳永源送到亞洲學生療養院去療養的時候，全場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有些同學發現在場的黨員沒有鼓掌，他們回來就辱罵黨員沒有“良心”，公然質問黨員為什麼不支持。有少數人還說要“示威遊行”，有人甚至說：“如果有槍，我就要干！”

第二次“民主台”之后，曾文三和李家明密謀把“民主台”由东边搬到西边去，由于遭到了一部分团员的反击，才被迫停止。

三、“伸冤团”

“民主台”一停止，这个集团西边另两个核心分子王德化、陆皓长又策划了“伸冤团”。随即曾文三也轉入了这一活动。

“伸冤团”有一个完整的組織綱領和行動綱領。在組織方面，設有正副主席，下有秘書處、財務處，并有采訪、宣傳、聯絡等組。行動綱領是：先建立組織；然后收集材料在校內報告、作街頭演說、向法院起訴、投寄國內報刊；第三步和各大學建立聯系，游行示威。

不久，黨委會察覺了他們的陰謀，找王德化談話，希望他們參加院裡已經成立的“肅反及其他遺留問題處理委員會”。于是曾文三、王德化商定要“借合法組織來干自己的組織（即伸冤團）的工作”。他們擬定了參加“肅反及其他遺留問題處理委員”的名单，准备打入这个組織中去，把專案小組掌握起來，然后就可為所欲為了。王德化曾收集了許多捏造的材料，和一些反動的大字報，寫成了幾萬字的信，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控告過。可是，由于當時第一次反黨高潮已接近尾聲，他們的陰謀在一開始就已被察覺出來，遭到了反擊。

四、一封誣蔑性的電報

曾文三還曾經用請求上級派人幫助整風作幌子，欺騙機械一系三、四年級的同学，用他們的名義，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發過一封電報。在曾文三起草的这个電報中說：“……以彭天琦為首的學院黨委會，私設監獄，私設刑堂，對我院三百多名無辜教授、職工、同学，進行精神折磨，肉體懲罰，非法搜查，

制造假証，严刑逼供，所犯下的严重地侵犯人权、破坏法制、歪曲政策等无法无天的罪行，現在我院一致表示公憤。为了伸張正义，維護党紀国法，我們特电函中央，要求立即派來檢查組，对我党委会进行严肃檢查，并作出公正处理。”

現在事实已經証明，曾文三在电文中向中央所反映的情况，完全是捏造、是誣蔑。但人們可以看出，曾文三是多么仇恨党，他恨不得把这个学校党委会的成員一个个拿去法办。

第二次反党高潮

这个集团在6月上旬又发起了以罢課、罢考、罢免学生会为中心的第二次反党高潮。

一、西边两次秘密會議

这次高潮最先的发起者是西边的全克里和蔡哲成，从6月5日开始，他們就在西边的电力系和动力系开始了串联活动，在6月6日、7日接連开过两次秘密會議。在6月7日的“九人秘密會議”上，全克里总结了第一次反党高潮的經驗。他說，在第一次反党高潮中，沒有及时向党提出条件，沒有及时建立他們自己的組織，因此失败了，这两个教訓这一次必須接受。因此，当时他們决定要組織一个二三十人的核心小組，核心小組要“純洁”組織，不要党团员参加。在會議上，有人提出要罢免学生会，改組广播台，全克里則分析說：“現在提出沒有用，只有立即形成罢課罢考高潮，在高潮中才有可能。”他还說：“等到与党委会造成平等地位后，就派选代表和党委会談判提出条件。”根据現在揭发的材料，在罢課罢考的高潮一出現后，他們首先要提出这三个条件：一、燒毀档案，公开档案；二、把肃

反后判刑的分子放出来；三、惩办“违法乱纪分子”（指肃反干部）。

二、东西边右派首脑的“五人秘密会议”

要形成全院性的罢课罢考高潮，光是发动西边两个系力量还是不够的，6月7日全克里、蔡哲成找到了曾文三、陈律恒和張景发，这五个右派头子又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共同来发动一次罢课罢考的高潮。曾文三在会上提出在明天（星期六）晚上看电影时，由他到广播室去作煽动性的广播，要全克里、蔡哲成等组织同学在台下鼓掌支持。早在这次秘密会议的前一天晚上（即6月6日）曾文三就写出了他的广播稿。在这个稿子中，曾文三提出要罢免“御用学生会”，当场举行信任投票，办法是凡是在电影票上打“○”者表示信任，打“×”者表示不信任，然后当场监督开票，星期天早上通过广播台揭晓投票结果。

三、一夜美梦

“五人秘密会议”一开完，一个罢课罢考的宣传攻势就在当天晚上出现了。晚饭时，就贴出了十一张要求罢课罢考的大字报，他们造谣说武大等学校已经“停课”，并提出“不支持停课停考就是压制鸣放”。西边的右派分子还准备自己安装广播器来进行宣传，和院里的广播台对抗。这一天这个集团东西边的成员几乎全部出动，一直忙到深夜。当时他们满以为可以一触即发。蔡哲成曾作出了这样的估计：“同学们要求停课不考，只有少数党团员拉后腿，但是我们已掌握了大局，他们是起不了作用的。”

这个集团的右派分子做了一夜的美梦，可是仅仅是一夜而

已。6月8日，党委会发出了告全院同学書，明确表示了态度，揭穿了罢課罢考的阴谋。广大同学随即发起了强大的反击，打退了他們的第二次反党高潮。

（原載1957年9月10日“长江日报”）

“反官僚爭同濟”是怎么一回事？

“反官僚爭同濟”的由來

5月中旬，武漢醫學院的鳴放運動剛剛開始，二年級丙班六小班有的同學提出了“恢復原校名——同濟醫學院”的意見。學生祝進和陳世勛等人認為這個問題可以欺騙同學，可以得到人心，於是他們計上心來，在群眾中造謠：說什麼修改校名是在“肅反的壓力下”進行的，說什麼修改校名只是“兩三個人決定的”；說什麼把“同濟”改為武漢醫學院是吞沒了“同濟的光榮歷史”……除了造謠外，就提出了“反官僚爭同濟”、“不斗倒官僚主義的領導（指學校黨委會）爭回同濟，誓不收兵”等煽動口號。接着，就成立了一個反黨的領導組織——“反官僚爭同濟”編委會，展開了向党進攻的“簽名運動”（贊成改校名的就簽名）。

煽動同學之間的不滿，侮辱反對簽名的同學

“恢復校名是沒有意義的”，當時有幾個同事寫了一篇文章，指出他們這種行為是錯誤的。這樣就引起了他們的怒火，當天就一連趕寫十八篇圍剿文章，攻擊反批評者為“無聊先生”，是“小官僚”，並造謠說，“反對恢復校名的都是山東醫學院轉系來的”，這樣就煽起了同學之間的不滿。不光這樣，他們還連續發表兩篇“告全體同學書”，號召同學們“和一切反對恢復校名者進

行斗争”。为了履行他們的諾言，他們就在二年級丙班当众侮辱和嘲笑反对“签名”的两个同学。

唐哲院长用事实駁斥謬論

过了几天，“反官僚爭同济”編委会宣称签名人数已达1700多人（其实有的一人签了几个甚至几十个名），他們認為有了本錢，就向学生会进攻，妄想夺取学生会领导权，进一步向党进攻。祝进等人一方面以“反官僚爭同济”发起人的名义贴出了醒目的“給全院学生的公开信”，要求学生会出面领导“签名运动”，另一方面就組織了大量的大字报、广播稿威胁学生会接受这种要求。学生会因为这个“签名运动”不是全体同学的要求，只是一部分人的意見，就沒有接受他們的要求。当时学生会主席朱海林（黨員）訪問了唐哲院长，反映了同學們对恢复校名的三种意見（有贊成、不贊成和不表示态度的）。在訪問时，唐院长叙述了“同济”历史，并說明了学校当局改校名并非与肃反有关，并且是經過征求很多教授的意見才决定的。最后他要求大家从团結出发可以討論这个問題。

把唐院长的談話內容公布以后，祝进等人就貼出大量大字报攻击唐院长，說唐院长“是1922年才入‘同济’的”，对“同济”的历史“不了解”，因而唐院长的談話是“毫无意义的”。他們的这种无理攻击，当时就有人发問：生活在“同济”三十多年的唐院长不了解“同济”历史，难道你們入“同济”只有几年又了解嗎？因此，尽管他們强辞夺理，可是他們已經开始显得孤立了。

妄想夺取学生会领导权，进一步向党进攻

当他們这一仗打輸了以后，就采用更加卑鄙的手段进行反扑。“反官僚爭同济”編委会也派人去訪問唐院长，想爭取唐

院长支持他們，可是唐院长仍然駁斥了他們的謬論。怎么办呢？訪問唐院长后，“反官僚爭同濟”的发起人就开会討論唐院长的談話，祝进等人提出把唐院长說的“對我們最有利的話”公布出去。于是他們就断章取义的公布了唐院长的談話，并声称“学生会公布的唐院长談話是朱海林捏造的”。这一下，他們就煽起了广大同学对朱海林和学生会的严重不滿，这时，祝进等人就提出要“罢免学生会主席”，要“解散学生会”，学生会要由“称职者”来組織，并謾罵朱海林是“猪仔主席”，罵学生会是“猪仔会”。祝进还派人把朱海林喊到群众面前“說理”，哄了他一頓。

学生会在他們的誣蔑、圍剿下，再次訪問了唐院长，并公布了唐院长亲手签名的声明書，証实学生会公布他的談話完全屬实。于是祝进、陈世勋等人的丑惡面目現形了，激起了許多同学的情怒，紛紛質問祝进等人造謠生事的用意何在？但是这一伙别有用心的人並沒有在真理面前低头，他們一方面运用大量的大字报来与群众进行狡辯，并发起反签名（即反对恢复校名者签名），玩弄阴谋进行应战外，一方面就暗地里糾集一些对党不滿的人开会討論了对策。指使一个同学发表一篇文章，說，“党团內已布置党团员反对恢复校名（根本没有这个事）”，于是他們就抓住这个“借口”公开向党进攻了。他們到处大肆叫喊，“党团組織压制鳴放”，大罵党团员是“警察”，是“MP”……于是空气又緊張起来，祝进等人就利用这个混乱时期，派了徐鴻展占領广播站，广播了署名春风（即祝进）写的“反官僚爭同濟”的广播稿，表明他們要“坚持斗争”，并公然号召“中間分迅速觉悟过子来，向反对派进攻”。

有位教授亲自出馬推波助瀾

就在这个时候，出現了一張署名“一群职工”的大字报，罵

唐院长是“傀儡”（唐院长是党外人士）。奇怪地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教授也出馮了，貼出了他的題为“为恢复校名問題鳴”的大字报。他大肆宣揚他四十年来在“同济”的功績，口口声声責备“官僚主义吞沒了‘同济’”。这篇大字报貼出以后，“反官僚爭同济”編委会的勁头很大了。辱罵張副院长（党委書記）、宋海林等人的文章和标語貼滿了整個飯厅和宿舍門前，他們再一次煽动同学“行动起来解散学生会”。同学们說，这一次是他們反党活动的最高峰。

“陈娟娟”原来是男扮女装

当广大同学听了学校当局的报告，認識了因關校名所引起的恶果（出現了同学之間、老师之間和同学和老师間不團結現象，因为这个学院是原同济医学院、武大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合并的，对于改校名，有的贊成有的反对）后，許多同学都平静的坐下来学习了，等待領導上合理解决这个問題。可是“反官僚爭同济”的几个发起人并不死心，除了用大字报誣蔑領導上“拖延時間欺騙同学”，是“欠債不还的老官僚”，企图再煽动同学反对党的領導外，曾运金还用男扮女装，捏造事实的办法，写出了一篇署名“陈娟娟”，題为“党性”的文章。

这篇文章大意是說，在一个傍晚，这位娟娟和她的爱人散步，娟娟就改校名問題征求她的意見，对方答称，因为我是“黨員”有“党性”束縛，无法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見，如果是无記名投票，就贊成恢复校名。文章还說，这是一个老黨員。言下之意，就是党内沒有民主，反对恢复校名的都是黨員。

这篇文章发表后，他們就在同学面前大肆夸奖“陈娟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橡皮套着的鋼鞭”。尽管他們采用了如此无耻的手段，可是也很难煽动同学起来了，因为广大同学不

象开始那样糊涂了。陈娟娟是誰呢？同学们查清楚了，原来是男扮女装。可是，这一伙人还不死心啊，他们还要“等机再起”，暗地里还向校内外发出大批的“呼吁书”，幻想再来一个反党的高潮哩！

他们只是为了校名嗎？

“不是为校名，是搞党委哪！”这是祝进对校外的人说的话。为了争夺党的领导，他们连“人选”也确定了，祝进、陈世勋两位反党头目要坐学生会正副主席的交椅哩！当然，他们绝不只是为了争夺这个学生会主席，而是为了整垮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他们憎恨共产党，憎恨社会主义制度。这里，请看看祝进这些话吧：

“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还不如封建王朝。帝王时代，皇帝下宝座请教，到处召集贤士，刘备三顾茅庐，就是例子。不谈封建王，就是反动的蒋介石，也很重视知识分子，然而今天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却是改造、不信任。”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实行了‘三三制’，取得胜利，那么现在更可以不要党单独领导而实行‘三三制’了。现在找不出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就可由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组成，以代替党委制。”

“我们国家没有民主，人民代表选举只是形式，象资本主义国家有竞选，发表竞选纲领，进行选举演说，这才可以算是民主。……民主要有物质基础——工业越发达，就越民主。”

把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连接一起来看，很显然，他们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校名！

据揭发：“祝进经常访问一些教授，
有的教授在热烈的支持他们。”

反右派的炮声一响，他们退却了。尽管祝进、陈世勋威胁他们的一伙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隐藏下去，但是大势所趋，曾经参加过他们活动的曾运金开始出来揭发了。曾运金说，祝进经常访问一些教授，访问的效果很好；有的教授热烈的支持他们；祝进还经常在校外联系。他还说，他们要把他们的“重要文件”和“工作活动”照下相片送出去……

（原载1957年7月9日“湖北日报”）

武昌商业学校里的风波

——反动分子陈恕是怎样制造学生闹事事件的

几个不速之客

6月14日，湖北省武昌商业学校突然来了四个不速之客，他们都是这个学校1956年毕业的学生，据说他们匆匆地由黄石市赶回母校来，是为了借几本参考书。可是当他们随便借了几本书之后，却坐下来没有走，神色焦急地在等待什么似的。不一会，商业学校语文教员陈恕回来了，这四个不速之客立刻被请进了陈的寝室，关上門，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四个人又匆匆地离开了商业学校，其中有一人过江到市百货公司、文化用品公司找同学串門子去了。

两天以后。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八点多鐘，又有一个1956年毕业的学生，从汉口赶到武昌商业学校来，他找到了几个学生，在寝室里，从身上掏出一张大字报来，笑嘻嘻地说：“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礼物。”这件“礼物”——标题为“社会主义学校，资本主义教育”的大字报，九点多鐘，在学校的墙壁上张贴出来了。这张报极尽诽谤煽动之能事，说商业学校用资本主义的宣传方法把学生“騙”进来的；学校招生是把青年拖进“肺病监狱”；商业学校学生“人格带有过渡性”；要求“立刻停办商业学校”等等。

一場風暴卷起來了

隨著那張煽動性的大字報張貼出來之後，各式各樣的標語、大字報就在學校的各個角落出現了。

203班一些學生提出了要求民主，反對壓制；要求學校當局解決“前途”問題；要求學生成立檢查組，檢查學校工作；要求推遲考試，問題不解決，決不考試等等八大要求。

“打倒黨支部”、“堅決拔掉壓制民主的校長和黨支書”等反動、荒謬的標語也出現了。

什麼“商業學校是第四等學校”，“商業幹部過剩60%”，“去年畢業同學工作分配不當，賣包子，站櫃台，挑油担竇的都有”的種種論調也相繼出現。

學生們三五成群，議論紛紛，“罷課”、“撤換校長、黨支書”的呼聲也喊出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毆打青年工人杜傳忠的事件也發生了（詳情請參看本報7月13日報道）。

與此同時，學校的黨、團組織，學生會也被“否決”了；黨團員出來講話時有人“噓”！班主任出來講話沒人聽；校長和黨支部書記被人“監視”起來；學生會主席被“罷免”，他們自己組成了一個四十多人的“學生代表會”，由幾個總代表指揮一切。

學校內出現了帶臂章的糾察隊，把住校門，不許“閑人”出入；校長室門口也安了崗哨；學校所有電話機都有人把守。

一次小匈牙利事件在商業學校出現了。

陳恕——組織者和策劃者

所有這一切的有計劃行動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是誰呢？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語文教員陳恕。

陈恕“苦心孤詣”要搞垮商业学校，不仅作了較长时期的“思想准备”工作，而且进行了“組織准备”工作，“物色”了一批鬧事的“領導人物”。

整风开始的时候，陈恕就跑到华中师院、武大、湖北师专等地去“学习整风經驗”，回来后，在师生中大肆煽动，要出大字报；要向其他单位“看齐”。在党召开的座談会上，大声疾呼要学校“解决学生的出路問題，不能浪费学生的青春”。

另一方面，他偷偷地积极培养他的几位“得意門生”——台灣反动軍官的儿子，沒落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資產階級、富农的儿女。經常找他們“閑談”，把其他学校学生鬧事的情况講給他們听，并且“諄諄教导”：“不論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領導、有組織的进行，否則就不会成功。”这些一貫敌視党和社会主义的人，在陈恕的“教导”下，他們毒惡地誣蔑党是“巧妙的統治者”，并說：“党的缺点太多，要解决，一定要采取匈牙利事件的方式来解决。”有的在日記中写下了“志愿”：“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力量，攻破商业学校的堡垒。”（指党、团組織）在这次鬧事中，这些人更狂妄地叫喊：要把商业学校“鬧翻”，把共产党“鬧垮台”，“要讓国民党来当天下”，还說：“如果商业学校也鬧匈牙利事件，我有手枪，第一个打死校长和党支書。”这些人要同学们举手宣誓“斗争到底”，給团总支写恐吓信，揚言“要斬断团总支的猪头”。

反党的高潮

“学生代表会”一成立，就在陈恕的指示下召开了會議，根据 203 班提出的“八大要求”（这是陈恕最“欣賞”的，陈恕一看見 203 班的“八大要求”，就高举双手贊成，并高呼“烏拉”），拟出了“斗争”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针对打了工人社傳

忠后发生的情况，通过四项决議：写信給报社，争取社会同情；向法院起訴，控告杜傳忠侵犯别人自由，扰乱治安；要求各大、中学校支持；派人过江串連毕业同学以为外援。于是“总代表們”連夜起草了控告信，并且决定罢課。

第二天学校絕大部分班罢課了，“代表們”也分头出去活动。这时，曾經到过商业学校的几个不速之客，从黃石市寄来数以百計的印刷品和标語，內容都和第一次出現的大字報，203班提出的要求一模一样，咒罵校长是“討好上級的官僚主义者”，党支書是“施行資產階級教育的专家”，团总支是“土皇帝”等等；号召“同學們！起来斗争吧！我們坚决支持你們”。在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學生們更加盲动起来，18号下午全校罢課。在鬧事头子的操縱下，學生們拒絕与学校当局合作，不回答前来了解情况的干部們提出的問題。

陈恕，这个幕后組織者的活动，更加頻繁起来了。

当学生在毆打工人杜傳忠的时候，陈恕对学生們出点子：“这是工人不对，闖进别人学校就是扰乱治安。”工人代表在办公室与学生代表談判，陈恕就在窗外作指示：“这是一小撮工人，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階級。”“学生代表会”的“代表們”把決議和起草的控告信給陈恕看时，陈恕一边点头称好，一边拿起笔把“拘留工人一、二小时”改成“为了解情况，請工人进校交談一、二小时”。又对“代表們”說：“我們的錯誤不忙檢討，工人錯誤地方要着重写。”还向“代表們”建議：說制材厂的工人之所以和学生鬧事，是因为工人要求与学生联欢未遂之故。

杜傳忠被打后，对于商业学校学生的鬧事事件和貼出来的反动标語，社会輿論一致指責。陈恕看到苗头不对，于是趁校长召开全校教师緊急會議之时，大搖大摆跑到203班，发表了一篇演說，一开口就說：“我坚决支持你們的正义斗争。”接着分析

了目前情况，对学生們說：“当前内外对你們都不利，一个人不能挑两副担子。”要学生們“團結起来”，“各个击破”，“外部問題”交給学校解决，“内部問題”則要求“速战速决”。

党支書喻汉起在全校大会上說：“罢課，鬧事，打工人不是帮助党整风的方式。”下来之后，陈恕找到“总代表們”說：“斗争要看情况发展，提出不同口号，目前你們不要提帮助党整风，應該把要求解决‘前途問題’提到第一位来。”

18号下午，陈恕听說商业厅魏厅长要来校作报告，就跑到学生那里去，傳播了这个消息，并講了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說师专学生如何把××首长包圍在飯厅里，提出許多問題，把首长弄得下不来台，并且連声称赞师专学生“善于斗争”。最后“漫不經心”地提醒学生們：“今天下午魏厅长来作报告，如果你們只去几个代表，提不出什么問題吧！”果然，学生們在陈恕的暗示下，在“总代表們”的催促下，大家都去听报告，當場包圍魏厅长，提出許多无理要求，逼着魏厅长立即答复。

反右派斗争展开，陈恕的阴谋全部揭穿

由陈恕一手策划起来的商业学校学生鬧事事件，在强大的社会輿論譴責下，在党耐心教育下，絕大部分同学猛醒过来。

商业学校反右派斗争展开了。

陈恕，这个狡猾阴險的反动分子，看到“大势已去”，突然写了一篇标题为“亲切的劝告”的大字报，指責学生們鬧事不对。可是暗中他仍在进行活动，一方面，把家里全部文件燒毀，跑到校长那里去，摇头叹气地說，“我太老实了，我被学生利用了”，一方面指示他的“得意門生”，那批在鬧事中的“总代表們”退却。

可是商业学校全体师生，却把陈恕——一贯仇視党，曾經在旧社会参加过“青紅帮”的流氓，学生鬧事的头子——的所作

所为，阴谋诡计全部拆穿。

他在全体师生中，彻底地孤立了，人们还要进一步追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原载1937年7月22日“长江日报”）

李蕤——披着作家外衣的个人野心家

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反右派斗争，正逐渐深入，对又一右派分子李蕤，作了全面的揭发，并在许多问题上进行了辩论。根据揭发的事实说明，作协武汉分会长期存在一个突出的极为反常的现象，就是有两个领导中心。一个是党的领导核心，另外一个则是长期与党的领导对垒的“领导”力量，这就是以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李蕤为中心的一股暗流的存在。

李蕤一向是以一个“坚持真理”“不偏不倚”“正直敦厚”的作家的面貌出现的，但是经过大家的揭发，李蕤原来却是一个经过长期乔装打扮的耍着两面手法的个人野心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积极组织对党的领导“里外夹攻”

从今年4月开始，李蕤即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帮助党整风的名义，由隐蔽方式转为公开的向党进攻。大叫“春风不渡武胜关”，说“籠罩”着“乍暖还寒”的“低气压”，对武汉党的文艺领导与文艺工作进行了诬蔑和攻击。在作协分会内部，李蕤又糾结右派分子姜弘向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整风开始，在党支部邀请他们参加的处理一个党员错误的一次支部大会上，李蕤煽动群众说“现在大家的兴趣”不在这个党员的错误，“而在领导”，将矛头引向党的领导，完全破坏了党的会议的进行。姜弘在会上硬逼党组要把他自己在肃反时写的反省材

料还給他；李蕤則大叫說肃反工作还不如国民党，因为他認為“在国民党时坐監獄，老婆孩子还可以接見”，而肃反对象却与老婆不能在一起，这是不講“人道”的。李蕤还不断在群众中煽风点火，攻击党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說人事档案是“生死簿”，認為把干部分成积极、落后就是把人分为“統治者、被統治者”。肃反运动中，河南曾有許多材料揭发李蕤与苏金伞小集团問題，武汉分会党组經過慎重調查研究，認為还不是反革命性質，未公开对他进行群众性的审查。但李蕤除了将整个肃反工作，描繪得阴森黑暗以外，在作协分会党组召开的整风会上，大叫對他的問題是“武汉分会与河南的宗派主义相呼应”，并伸手要看档案材料。李蕤还在暗中指使姜弘在整风会上向党进攻，不要“打花拳”“打白点子”，要“击中要害”。在这同时，武汉市文艺界其他右派分子，对武汉市文艺领导和分会的工作，也放出了許多恶箭。李蕤对所有这些都为之欢欣鼓舞，向分会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姚雪垠等連連报“捷”，認為右派分子的进攻是“揭盖子”“倒苦水”，象“潮水似的意見，正打向統治了人們許多年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

李蕤发表在“桥”第三期上的“談嗅覺”（笔名华弓），“长江文艺”六月号上的“注意脚边的小草”，就是向党进攻的两顆炮彈。“談嗅覺”一文对于党領導的政治思想斗争进行了瘋狂的攻击，要求党解除思想武装，他說：“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上，在对待学术討論的問題上”，“應該把全身甲冑、荷枪实彈、怒目向前的‘嗅覺’，穿上便服，轉业为和藹忠实的傳达”，他把党的領導看作是“习惯于发号施令”者，是不用思想，毫无辨別能力只凭“嗅覺”行事的人；他并以“香樟子”为喻来丑化党的領導干部。“注意脚边的小草”是一篇煽动性的文章，文中說武汉不仅“春迟”，就在大家“催春”“催花”声中（系指省市召开的鳴

放座談會），在“大家腳邊却躺着一棵小草”，“被人踩得奄奄一息，半死不活”。他以種種罪狀，指控黨對文藝的領導，煽動大家不要僅停止在“鑼鼓喧天”，“上七下下”，“斥責教條主義”上面，而要“找出教條主義的附着點”。

李蕪的反黨活動，並不是毫無準備毫無計劃的，也不是在單槍匹馬的進行。他糾集了姚雪垠、姜弘等右派分子，要組織一個對“武漢三大主義”的“里外夾攻”的局勢，這就是他們反黨活動的一個中心步驟。

李蕪給姚雪垠寫信說“真正把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揭出來，還得有几个闖將”，應該說姜弘正是李蕪反黨活動的得力“闖將”和助手。篡改“長江文藝”的方向，首先是他們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個時期，李蕪利用他全權領導“長江文藝”編輯部工作的機會，勾結姜弘，將“長江文藝”的理論部分引向資產階級方向，變作了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在“長江文藝”五、六、七三期上的雜文、短論、文藝筆談等欄內，發出了一系列向党進攻的毒草，其中除了個別文章是自由來稿，其他都是在李蕪的主持下，或由他自己出面向作者鼓動拉稿，或由姜弘積極活動，組織來的。他們是有計劃地要“改變刊物的面貌”“加強刊物的戰鬥性”，“要集中力量批判教條主義”。李蕪在編輯部一再指示要把加強雜文的組稿工作作為“中心任務”來完成，因為雜文是“短兵器、匕首、利刃，作戰有力”；並提出組稿要抓“具體矛盾”，“發雜文要集中”“要象行船一樣槳要向一個方向划”。為此理論組搜集了武漢市某些文藝領導同志所有的報告文章和作品，並在理論組具體分配了任務，打算對這些同志進行全面的攻擊。在北京的姚雪垠給李蕪也來信建議在“長江文藝”上專辟一欄，要給所謂“受壓制打擊的作家”說說話（按李蕪的說法），姜弘則認為這應是“有冤訴冤有苦訴苦”欄。果然在“長江文藝”

七月号上辟了一个“文艺笔谈”的新栏目，集中发表了多篇反党的文章。可见李蕤提倡“长江文艺”的所谓战斗性就是反党的战斗性；要“长江文艺”划向一个方向，这就是划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方向。

李蕤、姜弘等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攻击中共武汉市委在1950年提出的城市文艺“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李蕤和姜弘反对这个方针是蓄意已久的，早在1953年武汉市进行关于工人文艺方针的讨论时起，他们反对这个方针的观点就一致。姜弘在反胡风斗争中，因为与武汉胡风分子的关系受到审查，李蕤认为姜弘的被审查就是由于反对过工人文艺方针，是“被迫害”者，便对姜弘十分同情。到大鸣大放前后，李蕤通过历次座谈会首先对李尔重同志代表市委提出的工人文艺方针问题进行攻击，同时在他与私人的接触中，对某些记者的谈话中，也无时不在尽量片面地歪曲这个方针，宣扬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并一再表示要写批评文章，在武汉市文艺界散布了一种恶劣的影响。李蕤更积极地出谋划策，支持鼓动姜弘写攻击工人文艺方针的文章，他不仅从策略步骤上给以指示，并且在内容上具体帮助补充修改。姜弘原打算只写一篇评论文章，但李蕤则授意姜弘首先把他所谓几年来被迫害的“遭遇”写出来，拿到“文艺报”发表，然后再写论文，认为这样可以“更有力”。这就是姜弘发表在“文艺报”十三期上“一个青年批评工作者的遭遇”这篇文章的产生。接着姜弘又按着李蕤既定的步骤，写了第二篇文章“把文艺引向何处”（未发表）。姜弘在文章中尽量将李尔重同志有关工人文艺方针问题的文章、报告片面地断章摘句，歪曲夸大，但李蕤仍认为“还不够有力”，并具体提供了许多所谓“歪胳膊拐腿”的例证。在这个问题上李蕤和姜弘还到处组织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其他右派分子写文章，向党

的領導展開猛烈的進攻。

同時李蕪還在文藝界煽風點火，興風作浪。不管在座談會上或私人接觸中，一遇到有反黨的言論，或所謂有“怨氣”的人，即跟踪上去，進行組織聯繫。在省文聯主席團擴大會議上，湖北日報右派分子宋西借一篇有錯誤內容的雜文“談鞭打”未予發表，向“湖北日報”領導進行了惡意攻擊，李蕪不僅寫了“注意腳邊小草”這篇文章與之呼應進行煽動，並命姜弘組織宋西將這篇雜文的“遭遇”寫成特寫，打算發表。同時又對“湖北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說“湖北日報”如果有“氣魄”，就應該把這件事“報道出來”，作為鳴放的“靶子”。湖北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江云在作協黨組召開的座談會上，對武漢市黨的文藝領導，對反胡風鬥爭，尤其對黨員的黨性問題作了惡毒的攻擊和誣蔑，李蕪則贊賞倍至，再三命姜弘組織江云寫文章。武漢大學右派分子程千帆也是他們組織的主要對象之一。即使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宋謀瑒路過武漢，李蕪以及姜弘也不放棄機會，組織他參加了座談會，寫了反對積極分子的文章。

根據會議的揭發說明，李蕪糾集姜弘在武漢所進行的這一系列活動，與在北京的姚雪垠都是勾結着的。他們通過信件往來，互通聲氣，密謀對武漢“三大主義”展開“里外夾攻”。姚雪垠發表在今年“文藝報”第七期上的“打開窗戶說亮話”，就是他們實行“里外夾攻”的一篇露骨的反動“傑作”。但，李蕪讀了以後，給姚雪垠寫信說“文章寫得很好，但還似仍未盡意，話再‘亮’些也無妨”。要他“不妨結合更具體的問題，揭露一下那些人的嘴臉”。李蕪還為武漢“人少”“形不成抗衡的力量”（給“文藝報”記者的信）而表示焦急，因此在他給姚雪垠的信中殷殷希望他能回到武漢來，以便組織更猛烈的攻勢。大鳴大放期間，李蕪還是“文匯報”在武漢得力的支持者，他曾給“文匯報”記者提供

許多歪曲的情況，並且推薦姜弘為“文匯報”在武漢的特約記者。當“文藝報”一度為一部分右派分子掌握的那一階段，李蕤也與之保持了聯繫，歪曲地反映了武漢“鳴放”的情況。並積極為其拉稿，“文藝報”上對武漢分會進行攻擊的“黑戶下的種種”那篇文章，就是通過李蕤代為組織的。

這期間李蕤幾乎是尋求一切機會企圖從各方面組織力量向党進攻的。他曾給姚雪垠寫信，要姚雪垠和他一致對河南的“宗派主義”“提提意見”。同時他還企圖通過“鄭州日報”的右派分子李晴的關係，在河南點起一把反黨的火焰。李蕤在給李晴的信中指示他說這次運動的“鋒芒是對領導的”，因此便不能“請求批准”，認為“只有一個辦法，便是自動開會、寫文章，將他們的軍”，並授意李晴將“幾十個”業餘作者“聯合”起來“開會”，“在報上喊叫喊叫”，要他寫文章給“人民日報”“文藝報”，認為這樣就會“敲響官僚主義的堂鼓”。他說根據他的“經驗”，“官僚主義是只怕大聲喊，不怕小聲央告的”。同時李蕤還到處寫信，叫某人在右派分子反黨的惡浪中“當仁不讓，大膽發言”，又叫某人“毫無遲疑地拿起雜文的武器，參加目前這個熱熱烈烈的戰鬥”。

總之，李蕤這個時期不僅勾結姚雪垠、姜弘，從北京、上海到武漢，從作協武漢分會的外部到內部組成了向武漢市黨的領導以及作協分會黨組織的一股“里外夾攻”的狂飆，並且尋求一切機會在全國右派分子向社會主義向党猖狂進攻中，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其反黨氣焰幾乎不可一世。

企圖篡改黨的文艺路線，取消黨的文艺領導

李蕤這一切反黨活動幾乎都是掩蔽在反教條主義、反庸俗社會學、反宗派主義的幌子下進行的。他認為“武漢市黨的文艺領導對文艺的許多根本問題”作了“庸俗社會學的、教條主義的

理解”。他所說的所謂“許多根本問題”，总起来就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問題，他歪曲說党的領導“只強調政治”，不要“文艺特質”。这就是李蕤这几年来所牢牢抓住不放的向党进攻的主要的“靶子”。李蕤抓住这些“靶子”，他所真正要攻击和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他首先是对武汉市解放初期提出来的“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工人文艺方針，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和歪曲。他認為这就是忽視文艺特質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論”。李蕤之所以如此攻击这个方針，是否由于他是十分重視工人文艺运动呢？根据會議上的揭发，說明事实恰好相反，李蕤是从来没有关心过工人文艺运动的。他看不起工农作者的作品，象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工农作者的創作，他是一律以“平庸灰色”“水平低”“公式化概念化”而加以排斥的；武汉市工人文艺活动，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开展，曾参加全国工人文艺会演取得优秀的成績，每年武汉市举行工人文艺会演时，都送票請李蕤觀摩，但他却很少去看。1953年在討論武汉市工人文艺方針的座談会上，李蕤公然說“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提法就成問題，文艺就是为‘人’服务的”。露骨地表明他借反对庸俗社会学为幌子，而企图根本否定这个工人文艺方針的作用和意义。李蕤始終是以保卫毛主席的文艺方針，坚持文艺上两条路綫的斗争的姿态出現的，他自認為在武汉市只有他是既反对文艺上的非政治傾向；也要求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統一，反对忽視文艺特質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是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确原則的。但会上有不少人对他給以有力的揭发和批判。当1949年中南地区剛剛解放，当时強調文艺应以普及工作为主的时候，李蕤在河南却坚持要在省文联主办的“翻身文艺”之外，办了一个大型的提高性的刊物“河南文艺”，他确定的刊物的对象是“上到大学教授，下到农民”。嗣后对武汉市工人文艺方針問題，李蕤則片面強調艺术特性問題，

脱离客观实际基础，片面要求工人文艺的艺术质量。当“长江文艺”编辑部，根据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精神，检查编辑工作，李蕤却反对刊物检查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又当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深入开展以后，“长江文艺”编辑部进一步检查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问题和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李蕤竟对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这个中心问题完全避而不谈，却片面地孤立地提出今后“长江文艺”的“压倒一切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拿出好的、质量高的作品出来”。他只强调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而反对提出文艺上的思想斗争问题。他认为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这里而就“包含了为政治服务”“包含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了。在反胡风运动结束以后，李蕤进而说：“今后更不必担心再有什么胡风文艺思想出现了。”就是说文艺上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已不存在了。他因为要求“好的质量高的作品”，他在“长江文艺”的编辑工作中，不仅对工农作者的创作，同时对于密切结合现实斗争的某些特写和作品，也都以“平庸灰色”或“公式化概念化”而加以排斥。

从李蕤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五周年而写的“温‘故’而知‘新’”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出他的文艺思想的实质。他在文章中指出毛主席的“讲话”是从“客观事实，客观事实向革命文艺提出的任务”这个基础上指出的“中心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说今天的这个“中心问题”并没有改变，但却又强调“不同的只是现实情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就是“阶级矛盾退居于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突出”了。在这里李蕤首先似是而非地只谈“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有意避开毛主席在“讲话”中反复进行深刻阐释的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问题不谈。其次，当他强调了现实情况的变化以后，又含糊其词地说：“作为上层建筑的文艺，

不采取这个途径，就不能发展，不能和基础相适应”了。这就是“中心问题”虽没有改变，但现实情况有了重大变化，文艺的“途径”就必须随“基础”而有所改变了。对这个问题，李蕤在湖北省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有过较明确的表露，他说“现在‘百花齐放’与为工农兵服务的关系，现在对文艺方针的提法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的提法”已“有所不同”了。李蕤在这里实际就是以“现实情况”的改变为借口，来企图偷偷地改变毛主席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文艺方针。另外，李蕤对毛主席指出作家思想改造的方针在实际上也是抗拒和反对的。李蕤说思想改造的“最有效的办法，除了深入群众生活学习马列主义之外，就是无顾虑的‘放’和‘争’，在‘放’和‘争’中，就会逐渐地把立足点移过来”。这样就似是而非地偷偷将在“放”和“争”中逐渐移过“立足点”来代替了毛主席强调指出的作家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来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李蕤还一向是以关怀和培养青年作家为标榜的，但经大家揭发，实际上这几年来李蕤对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也是抗拒的，他不仅对工农作者以及初学写作者的作品轻视和排斥，同时他还曾借口改进培养青年作者的方法，反对“长江文艺”的通讯员工作。当“长江文艺”编辑部为改进工作方法，改变了通讯员的组织形式以后，李蕤对这个工作却并没有表示任何兴趣。当他直接掌握“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的阶段，根本没有研究过一次关于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对这方面工作，既没有作过任何一点指示也没有表示过任何关心，就是充分的说明。

总之，根据会议的揭发，说明李蕤的文艺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完全对立的，但他却经过巧妙的伪装，表面上打着的是反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旗号，却极其恶毒的攻击党的文艺方针，他一手拿着的是拥护毛主席“讲话”的幌子，而一

手却反对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抗拒进行思想改造；他反对所谓“光谈政治忽视艺术”，强调“艺术特质”，实际是企图否认艺术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的普及工作。他借口反对“平庸灰色”的作品，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实际排斥的是工农作者的创作，排斥文艺为当前的斗争服务。他以坚持文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标榜，为的是抹煞文学艺术中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他以青年导师的面貌装扮自己，实际是轻视工农群众排斥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

李韃还以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为名，凶猛地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党对文艺领导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统治”，认为文艺界缺乏“学术讨论的空气”“压制批评”，在许多问题上都给他“压力很大”。他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是十分巧妙地以反对某些党的领导同志，或通过文艺问题的争论为借口的。他攻击和诬蔑党的领导同志是“一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当权者”，是“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封建统治式人物，是“以‘改造者’自居的”“滥用党的威信”的人，是“居高临下，粗暴简单”习惯于“扣帽子、打击、消灭、铲除”别人的人，是“站在群众之上”“做纠察员”，对别人“口头上虽然有团结，心底里却只有斗争”的小人，是一些“常有理”、“糊涂涂”、“惹不起”的丑角。这反映了他对党的文艺领导的露骨的蔑视和仇恨。他认为“武汉市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二文艺领导干部”觉得“朕即党国”“代党立言”，他认为这些“教条主义者”没有“写成黑字的作为体系的文章，而多是通过会议、训话……等等渗透进工作的”。因此他因为党对文艺的领导如此“渗透进工作”犹如“铁锈和湿雾一样，弥漫各处”，而感到极其愤怒与仇视。他对党的领导的不遗余力的攻击，就是为了达到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瓦解党领导的文艺战线。在文艺路线上他所追求的是不要有任何约

東的資產階級的“藝術自由”，就是取消無產階級的藝術路線，代之以反動的資產階級藝術的道路。

兩面手法魅魍伎倆

大家在會上還以大量事實揭露了李蕤進行反黨活動的陰險隱蔽的兩面派手法。數年以來，李蕤一直就是耍着兩面派手法，使用魅魍伎倆，拉攏群眾，挑撥離間，破壞黨的領導威信，培植個人勢力，處心積慮，不遺余力地向黨進攻的。

首先他在群眾中把自己裝扮成受“打擊、排擠”“有職無權”受迫害的樣子，他把黨員同志與他在藝術問題上和工作上的爭論，都歪曲為對他實行宗派主義的打擊和壓制。他惡意地把革命隊伍分為“傲骨”和“媚骨”兩種，他贊賞所謂“抗上”精神，同情所謂“弱小”。他認為一貫堅持反黨的姜弘以及有反黨情緒、對黨不滿分子是具有“傲骨”、“抗上”精神的，凡受過組織批評處分或肅反中受審查的，他都目之謂“弱小”，而一一施以溫情，加以拉攏。對於靠近黨的黨、團員，積極分子，則誣蔑為“媚骨”“不是脊椎動物”是“奉迎拍馬”的人，而加以排斥打擊。在編輯部內李蕤就是對姜弘等一部分人異常寵信重用，對另一部分人則輕視排斥。李蕤認為一貫對黨抱着很深仇恨的姜弘就是他“年輕時代的影子”，很有“才華”，非常賞識，並說“在今天這個社會里就是需要這種敢於大膽干預生活的青年人的”。李蕤表示肅反時未能“幫助”某些被審查的人（他認為這些人是受迫害者），而內心里感到是“對這些青年人的負罪”。他曾對一個肅反中被審查的幹部說：“不要抬不起頭，要振作起來，全國胡風分子才七八個……”。黨內批評了一個黨員青年作者的某些驕傲自滿情緒，李蕤則表面安慰實則挑撥地說：“你這個人樹大招風”，意思就是遭到別人的忌恨。他知道某同志對領導有不滿情緒，就

加以挑撥說：“我和別人都同意提拔你，就是××不同意”。在編輯部經他同意決定的問題，如有些稿件的處理，他背後對作者則表示由於某人很“跋扈”“這個問題我作不了主”或“這樣決定我並不同意”。經由領導成員討論決定的問題，他可以拿去煽動群眾起來反對領導，並囑咐被煽動者說：“別說這是我告訴你們的”。總之，在分會內幾乎凡是黨的領導認為正確的應該堅持的東西，李蕤都反對排斥，反之，李蕤則都欣賞，並即乘機拉攏利用挑撥。只要那裏有可以破壞黨與群眾的團結，敗壞黨的領導威信的可乘之隙，李蕤的手臂就伸向那裏。他一方面以“溫情、友誼”從感情上拉攏一部分人，一方面即極力攻擊敗壞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同志都說成是不學無術，品質低劣，狹隘昏庸的人。據姜弘交代，李蕤在他面前“敗壞黨的領導的威信，進行人身攻擊，那是無法計算次數”而是“無時無刻，遇到機會就帶上幾句”的，他們的這些“私話”，幾乎“滲透”在他們每一次談話中，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就是黨的領導核心”。李蕤一方面敗壞黨的領導同志，施行人身攻擊，加以丑化污蔑，一方面則標榜自己是如何堅持真理仗義執言，如何能體現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路線和方針，以樹立自己的威信。李蕤幾年來一直攻擊武漢市文藝領導如何把政治與藝術、學術討論與政治思想問題混為一談，認為不僅在學術問題上壓制批評，不能自由討論，甚至還給批評者以政治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和迫害。他就是在保衛學術討論自由的幌子下，販賣資產階級的學術自由，反對政治思想鬥爭，進行反黨活動。他認為姜弘在反胡風鬥爭中受審查是把學術問題當作政治問題搞了。實際是他企圖將嚴肅的政治鬥爭放在學術討論的掩蓋下面加以歪曲和抹殺，並用之向黨進攻。如在反胡風鬥爭中審查姜弘時，僅有一位編輯同志對姜弘寫的一篇稿子的意見提出過異議，李蕤就馬上拿來硬作為領導壓制

批評進行政治打擊的罪証，長久抓住不放，直到今年姜弘寫“一個青年批評工作者的遭遇”這篇文章時，李蕤又提出來作為例証補充了進去。周勃（“長江文藝”編輯）寫了“論現實主義及其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發表在“長江文藝”1956年12月號）這篇文章，李蕤表示不同意周勃的論點，並寫了文章，在這個問題上他自稱是周勃的“論敵”。但當他不顧事實真象認為周勃受到壓制的時候（周為共青團員，上級團委同志曾找周談過一次話，李即歪曲為“壓制”），他的所謂“論敵”卻成了“盟友”，積極地為周勃奔走鳴冤，鼓動他給周揚同志寫信上告。至於對於學術問題本身的討論和研究，在這裡已完全是無足輕重的了。當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從各方面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反擊右派分子的社論，報紙上也發表了許多工人農民的意見，李蕤卻認為“這時候要工人農民出來說話，是否會妨礙‘鳴放’”？可見他所說的“鳴放”與討論大是大非的自由是不允許工人農民參加的資產階級的“自由”而已。他所謂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只不過是用來向黨進攻的幌子。李蕤曾經說與黨的領導同志“沒有共同語言”，因此他是“內方外圓”的，這卻正反映了他自己兩面派的政治本質。他的兩面態度幾乎是表現在各個方面的。當反右鬥爭一開始，李蕤馬上就寫了反右的文章“比一比”在“長江日報”上發表“歌頌”共產黨如何正確偉大，但同時就在“長江文藝”上積極向黨進攻，並到處點火鼓動要敲“官僚主義的堂鼓”，反黨氣焰正濃。李蕤從河南到武漢這數年來始終表示迫切要求入黨，並因黨組織遲遲未吸收他入黨而對黨“很有意見”。當今年5月上旬作協分會黨的支部大會討論他入黨問題時（上級黨委未批准），他表示“進入會議室就象進入懷仁堂一樣使他振奮”。會後有人向他祝賀，他却表示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搖頭嘆息並遲疑地說：“唉，這個時候……”，表現

与观点，争取支持与同情。然后又以此为“资本”在武汉文艺界渲染說北京某领导同志如何同意他的意見；宣揚武汉市文艺领导如何与北京中央的观点态度不一致。他把共产党看成是分裂的，而且他也就是企图在这里对北京和武汉起一个分裂作用，并以此拉攏群众。如他不仅鼓动周勃給周揚同志写信，他并到北京借題大肆宣揚武汉如何“压制批評”，回来又对周勃說你的問題我“已向北京反映”了，某某领导同志“都支持你”等。李蕤一直就是以北京或中央如何同意支持他，来显示他反党的气焰。讓人們感到似乎他才真正是与北京与中央精神一致，真正能正确貫徹中央方針的“不偏不倚”的人物。所以当反右斗争开始以后，他感到形势对他不利时，他就急急給北京林默涵、張光年同志写信，企图要北京来保护他过关。

李蕤常常向人表示他对领导工作是“沒有兴趣”的，但这也就是他的两面派手法之一。李蕤早在河南为省文联副主任时，为了达到他个人野心的目的，就曾将有政治历史問題的或政治思想落后的一批旧相識，糾集在一起，进行宗派小集团活动，排斥打击党的领导与党员干部，当时省文联尚沒有党的組織，仅有的一个党员，就成为李蕤这个小集团的眼中釘，加以打击排挤，先后就有两个党员都被排挤了出去。因此在河南省文联會很长时期是一个党员也站不住脚的。甚至当李蕤于1953年調到中南作家协会以后，他仍給他在河南的心腹写信指示，要他們和党“爭取領導权”。他个人野心和权力的欲望表現得是十分强烈的。

从历史上看李蕤

李蕤这位一向自行标榜进步，讓人感到具有“高大”形象的所謂“非党布尔什維克”，他的历史究竟怎样呢？1939年李蕤在

河南国民党“陣中日报”工作时，就参加了国民党。1940年被捕，由国民党河南省伪参政员刘景健等保释。出狱后，为了“安全”计，即投靠了刘景健，此后，又由刘介绍他任国民党西北经济策进会视察员。1947年第二次被捕，十天后获释，同时在当时的河南“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对国是的意见”，对共产党进行了诬蔑，为国民党作了反动宣传。1948年河南解放前夕，很多进步知识分子都纷纷到解放区，当时河南地下党组织曾和李蕤联系，希望他也去解放区，但他却拒绝了，接着他跑到了上海，投靠了肖乾，并由肖乾介绍到了北京参加第三条路线的刊物“新路”的编辑工作。李蕤一直是以他早就靠近党的组织而装潢自己，但是他所靠近的却是刘国明(C.C.分子)郭海长(右派分子)等这些所谓“党员”。李蕤并且一直是以老进步作家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除了简单的涉历了他的历史以外，还可以从他所写的文章上看看他的所谓“进步”的面目。1946年就当蒋介石撕毁旧政协决议疯狂镇压进步力量，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李蕤在一篇论时政的“言路今昔叹”(发表在当时开封“力行日报”)的文章中却为蒋介石大肆捧场和抹金。他说：“文学是人民的心声，只要是贤明的执政者，向来是爱护并尊重的”，在这里蒋介石就是他所歌颂的所谓“爱护并尊重”“人民的心声”的“贤明的执政者”。文中称颂“蒋主席”是具有所谓“虚怀若谷的风度，律之古代，等于采国风，譬之近代，便是民主精神”的英雄人物，李蕤认为对于这个“贤明的执政者”的教导“只可惜最需要听话的人，并没有记在心里”。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李蕤对“蒋主席”的殷殷之情了。李蕤就是带着这样一些所谓“进步”与“革命”历史的包袱，参加了革命工作。几年来，共产党给了李蕤一些什么呢？对于李蕤，党所给予他的就是从政治上到工作上极大的信任和重视。1949年他在河南为省文联

副主任；列席了全國第二次政協會議；1952年抗美援朝時就曾去朝鮮，以後又兩次出國；1953年到武漢為作家協會中南和武漢分會副主席；曾先後為省市協政委員，現為湖北省和武漢市的人民代表，武漢市人民委員會委員；幾年來不斷請他參加不少黨內的重要會議，並在今年五月討論了他入黨的問題。總之，不管是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黨和人民已給了他所可能給予的信任、榮譽和待遇。但李蕤幾年來的所行所為卻一直是在施展陰謀詭計處心積慮地向黨進攻。就在黨內討論吸收他入黨的時候，他卻更形張牙舞爪地向黨進行了最凶惡的攻擊。

李蕤反動的政治觀點和社會思想

為什麼李蕤會在今天如此暴露他的原形呢？這是由於他對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從會議上揭發的許多事實說明，李蕤其所以是一個十分頑固而又十分堅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有他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根源的。李蕤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看作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他認為在我們今天的國家和社會中“群眾的意見積壓得太久了”“教條主義統治久久，各方不滿情緒如火山一樣，一爆發便頗為猛烈”，他認為今天“官僚主義”已“病入膏肓”，但他卻感到那些“黨員領導同志”並沒有認識這是“廣大群眾支援的對他們的改造運動”，是對“統治了人們許多年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熱熱烈烈的戰鬥”，因此他感到必須“投以猛劑”“用猛藥”要“揭蓋子”“敲堂鼓”，否則認為是“不足以解三尺之凍”的。他深深感覺到我們的生活似乎就將進入一個“可怕”的年代，社會矛盾已將無法解決了。因此他說如果沒有今天的鳴放，“讓各種矛盾統統‘表’出來，再過若干年，真有些不堪設想”了，他感到“共後果實在可怕得很”。這就是認為共產黨的形勢已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於是他自己表示“在

群众的感染与教育下”。就不得不“也准备卷卷袖子，扫掉身上的暮气”而“参加战斗”了。有人也许会觉得李蕤是否是由于一时对形势估计错误对问题认识不清而思想上产生了混乱呢？他自己开始就是想用这种解释骗人的。但从多天来的会议的揭发和辩论，说明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李蕤的反动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想是表现在各个方面和一系列问题上的。他把今天我们国家看成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封建统治，他在“注意脚边小草”这篇文章中所支持的思想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社会张士贵式的人物很多，而尉迟恭却太少了。他认为专业作家是“自食其力”，羡慕他们“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他认为反胡风斗争，肃反运动还不如国民党，是犹如封建统治者对人民施行血腥镇压的“瓜蔓抄”。有些人政治历史复杂，在肃反中审查清楚作了结论，李蕤并不认为这是党的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英明措施，相反他说：“你本来是人，别人把你打成狼，现在又要证明你是人而不是狼，你本来就是人嘛，又何必必要他们给你证明呢？”他对某些较老的党员同志是极端鄙视和痛恨的，他认为“这种人，跑到延安，跟在革命队伍屁股后而跑，没有犯过大错误，就这样爬上去了”。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李蕤表现得欣喜若狂，但当全国开展反右斗争后他为工人农民出来说话而深感不安，当卢郁文接到恐吓信，“人民日报”发了社论之后，李蕤则散布说卢郁文过去在河南对人民有过罪恶，今天他之所以这样靠近共产党就是为了“洗净自己手上的血”。反右派斗争开始，他说“为什么开展反右斗争，我估计，主要是因为全国人代会要召开了，如果不压一压，这个会上就不知将会出现什么局面？”这就是说这个“局面”共产党还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很难逆料的。这就是李蕤对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看法以及对今天形势的估计。这正是他反动思想观点的彻底暴露，这也就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思想的基础。

正因为他认为党的整个领导已濒临危机，已将无法领导下去了，而党对文艺的领导，则更是“病入膏肓”无以救药！那么要撑持这个局面又将谁属呢？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认为要收拾中国今天的“残局”，非民主党派出来不行，而李蕤则认为今天武汉文艺界的形势已非李蕤姚雪垠等人粉墨登场不可了。这一点早在五月廿七日李蕤给姚雪垠的信中就有了交代。在这封信中李蕤把党的整个文艺领导从“根本”问题上加以否定，认为已搞得无法收拾以后，于是他殷殷希望姚雪垠能够回武汉来，以便他们“大家一道，把这个摊子整理得有头绪些”，这个摊子如何才能“整”好呢？“改变工作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呢？按照李蕤的主张，就是要把作家协会改变成“学会”性质，由“作家轮流做工作”“而不是封定某些人为‘领导’”，不要什么“外行的干涉和胡说”。这就是李蕤所企图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李蕤所提出来的反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以及整个党的领导的挑战；这个纲领所要达到的就正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这个目的。其实，从他已经公布了的文章和背地的活动看，从他对党的领导的仇恨之深度看，他实际上是从文艺问题上提起，展开了对党与社会主义的全面攻击。

自7月9日到9月11日，两个月来，经过作协分会内部大小十七次会议以及党员同志与之多次个别谈话，又经两天文艺界的大会的揭发和辩论，李蕤的右派面目已完全暴露，但李蕤所采取的态度一直是顽抗的不老实的。对他的问题始终没有主动交代，而是步步设防，百般狡赖，态度十分恶劣。直到最后一次会议在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始不得不承认某些问题，但仍避重就轻，认识极不深刻。

會議仍在繼續深入進行。與會者一致表示，李蕤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揭發是武漢市文藝界反右鬥爭中的一個十分重大的事件，是鞏固黨對文藝領導的一個重大的勝利，因為數年來，武漢文藝界的不少混亂情況都是與李蕤有聯系的。這個鬥爭將繼續深入的開展下去，並將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繼續組織武漢市的有關幹部、工人及其他同志廣泛的辯論。

（原載1957年10月號“長江文藝”）

姚雪垠的反党面目毕露

自去年8月以来，姚雪垠即利用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又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时机，连续地在“长江文艺”、“文汇报”、“新观察”、“文艺报”、“旅行家”等报刊上，向党射出了大批的毒箭，主要的有：“谈打破清规与戒律”、“创作问题杂谈”、“惠泉吃茶记”、“打开窗户说亮话”、“要广开言路”、“卢沟桥礼赞”等。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姚雪垠疯狂地、全面地否定了党对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攻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对武汉以及全国艺术界的现状，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疯狂的攻击；并与北京、武汉的右派分子互相勾结，提出了所谓要对“武汉三大主义”“内外夹攻”的口号，企图摧毁党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反对深入生活、抗拒思想改造

长期以来，姚雪垠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进行了恶意的歪曲和攻击。

姚雪垠首先用所谓“发展”的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来否定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要跟着发展”。并歪曲地说“今天除了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分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企图偷天换日地以“为知识分子服务”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他肆意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诵去年的皇历”。姚雪

垠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評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正确原則为“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一个“总原則”而已,說“如果有人企图拿着一个总原則认为是找到了万能的鑰匙,随便使用,他难免不跌进教条主义的泥坑”。从这一根本的反动前提出发,他把党对文学事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誣蔑为教条主义的統治。說什么教条主义“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沉重的社会力量”。認為教条主义已成为“一种时代空气,或者象流行性的感冒,散布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作家在进行創作时,不能不縮手縮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是,姚雪垠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級“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張代替党的文艺方針。

姚雪垠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講話中鮮明地提出的作家必須深入生活和进行思想改造,从理論上是敌視的,从实践上也是抗拒的。姚雪垠特别要求尊重所謂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經驗”(按即指旧的生活經驗)。并把这种生活經驗強調到認為这是“沒法用金錢購買”的“財富”。認為不應該“机械地把生活經驗划分新旧,割断生活縱的关系。否則就是不承認生活是“历史运动的过程”,以此来抗拒深入今天的生活斗争和进行思想改造。他認為老作家因为有这种“独具的生活經驗”,不但写历史題材,就是写目前的重大題材,都是“特別有利的条件”,可是根据姚雪垠的思想,旧的生活就是作家創作的源泉。至于今天新的生活,姚雪垠却从来没有承認过对于一个作家有什么重要意义。相反地却通过各种方式頑强地抗拒深入生活进行思想改造,反对反映当前斗争生活。他說:“不要把当前生活孤立起来”。因为仅仅“一点当前的生活,往往缺乏真正的深度”。他竭力反对作家下去體驗生活进行創作有什么“指导思想”。因为那就是“教条”,就是“框框”。他又說:“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也提

出来一些創作的指导思想，但那是几个基本原则，可以灵活运用”。否則就是要求作家下去“按图索驥”，至于针对作家具体情况号召作家在生活中适当担任一些具体工作，建立生活根据地，那就是“划地为牢”，“捆綁”了作家的手脚。而姚雪垠恶毒的認為如此要求作家生活就如“皇帝住在深宮內”指揮在外軍隊作战一样的“遙制”。他对毛主席的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針如此仇視和反对，那么他所謂的“独具的生活經驗”又是什么样的“生活經驗”呢？这里有一段姚雪垠旧的生活的短短的記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五战区政治部設計委员会担任委員兼秘書。持着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介紹信”，在皖北一带进行“視察”。沿途接受国民党“县长”、“紳士”們的“欢迎”。县城里还贴着“欢迎劳苦功高的姚委員”的标語。当时，姚雪垠竟把这种欽差大臣式的“視察”，美其名曰收集有关抗战材料。这就是姚雪垠所恋恋不忘的所謂“沒法用金錢購買”的他的生活的“財富”。

反对党的領導，攻击党的文学事業

姚雪垠对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針的各級党的領導干部，都表示了最大的仇恨。当右派分子在各地兴风作浪、全国烏云乱翻之际，姚雪垠兴高采烈地写信給作协右派分子姜弘說：“北京鳴放，逐漸揭盖，不久可能有不少箭头对周揚同志射去。”他攻击党的文学工作領導干部是“大大小小的孔代表”，是“以无知冒充內行”，是“打肿臉充胖子”，称他們为“卫道者”，謾罵武汉文艺界的領導同志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不学无术”。姚雪垠歪曲地說“同領導同志作理論爭鳴也会給戴一个‘无組織，无紀律，对抗領導’的大帽子”。

姚雪垠借反对宗派主义为名，散播了大量的破坏党与非党

作家的團結、制造文艺界分裂的反动言論。把作家划分为“国民党統治区域生活的老作家”和“解放区出来的作家”。并煽动說：“过去在国民党統治区域生活的老作家，有很多人感到情緒压抑”；說“几年来他們的潜力也沒有得到应有的發揮”。姚雪垠还无中生有的造謠說：“有某些作品不好的，却被捧到天上那么高，这些被推崇的大都是党员作家或解放区出来的作家。”會議上，同志們列举事实和具体数字。彻底地駁斥了他的这种恶毒的造謠中伤，指出他的这种阴谋詭計，无非是企图挑动一部分作家起来反对党的领导、分裂党领导的文艺界，破坏党与非党的團結，从而制造所謂“两个文坛”。

姚雪垠还以反对宗派主义为幌子，反对党培养青年作者的正确方針，他敌視和排斥青年作者。罵农民出身的作家李文元是“被捧起来的”。他还借口党“不重視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經驗”，而輕視青年作家新的生活經驗和已有的成就。他誣蔑党由于“宗派主义作祟，发生了輕視和打击老作家的現象”。企图以此把老作家与青年作家引向对立，破坏新老作家的團結。姚雪垠从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場出发，对武汉市以至全国的文学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他誣蔑我們今天的創作情况是“公式化現象很严重”。“解放后几年中文学題材狹隘，作品写得干巴巴的”，“內容千篇一律。风格單調，正面人物形象四平八穩，如泥塑木雕”。他攻击“长江文艺”发表的工业特写是“肤淺干枯”，“毫无文学价值”，“都缺乏艺术性”，“其質量連象样的新聞报道还不如”。对通俗作品的成績，青年作者的成长，都采取了一概抹杀的态度，并进一步誣蔑說“武汉文艺界不成‘界’”。是“一团烏烟瘴气”。

总之，在姚雪垠看来，整个文艺领导工作就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封建統治，他認為“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到处布

置了絆馬索，等着你一万个小心中的一个疏忽”。在他看来，文艺界完全变成一个既沒有民主，也沒有真理，异常阴森凄惨的犹如“臣不能議其君，子不能議其父”的“封建时代”。姚雪垠打着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他的最終的进攻的目标是向着党的文艺方針与党对文艺的领导的。他企图从思想基础上，从政治方向上从組織領導上全面摧毁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为资产阶级文艺的复辟鳴鑼开道。

勾結右派分子，組織“內外夾攻”

姚雪垠不仅通过报纸、刊物和座谈会大肆放毒；还与武汉分会内部右派分子李蕤、姜弘互相勾結，向党进行“內外夾攻”。5月25日，他在北京一面写信姜弘，打探武汉的鳴放情况；一面写信李蕤，竟明目張胆地要李蕤改变“长江文艺”的方向。建議在刊物上“辟一专栏”，专门发表攻击党的文章。李蕤接信后，即与姜弘研究“怎样改变刊物的面貌”，并复信对姚的“建議”表示“不成問題”。果然，“长江文艺”7月号上就辟了一个“文艺笔談”的专栏，集中地向党投射了一批毒箭，首先在理論批評方面篡改了刊物的政治方向。

当姚雪垠的“打开窗戶說亮話”这支毒箭在“文艺报”射出后，李蕤、姜弘都向姚写信表示了“文章写的很好”。要姚繼續写文章。要他把話說的再“亮”些，給以支持鼓励。信中还对作协分会及武汉文艺界的情况作了恶毒的誣蔑和攻击。姚接信后，馬上給姜弘写信說：“接李蕤信，頗为振奋。”姚雪垠知道姜弘对武汉市委在1950年提出的城市的文艺“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方針是反对的。于是他指使姜弘把“几年来武汉流行为生产服务的理論以及如何压制反对者的事实”，及“王淑耘（作协武汉分会党組成員，长江文艺副主編）如何打击李蕤及老宋（李

“鞋爱人，长江文艺編輯)”等情况，写信告诉他。要姜弘为他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他还在信中恶毒地提出了对党进行“内外夹攻”的口号，說这样“力量也許大些”。与此同时，姚雪垠还与北京、河南等地的右派分子彭子岡、姚芳藻、梅荣、徐中玉、唐因、苏金伞等过往頻繁。与他們經常在一起交流反党的“内幕新聞”。并大肆傳播謠言。据他自己交代：当文汇报記者謝蔚明把“胡风放出来了，但还不能自由”的謠言告訴他后，他即到处傳播，还告訴了河南的右派分子苏金伞。而苏金伞回河南后也到处傳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徐士年写了一篇攻击党和誣蔑肃反运动的文章，姚雪垠也为他“參謀”，要徐从“宪法的角度”来誣蔑肃反运动，說“提到原則上，才有力量”。这时候，姚雪垠在北京的住处是“門庭若市”，精神上“愉快、振奋”，李蕤在給姚雪垠的信中，就公然称他这时候是“思想感情‘春暖花开的时候’”（这是姚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上走向堕落时写的一部色情小說的名字），并說姚今天“不为五斗米折腰，实在令人羨慕”。其反党妖焰的猖狂，可見一斑。

丑恶的历史，资产阶级的灵魂

揭开姚雪垠的“进步”外衣，暴露在人民面前的，却是一颗彻头彻尾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原来这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早在1929年混进了共产党内后，不久就开了小差；1937年，他又重新混入了共产党内，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极端艰苦的年代里，他在河南竹沟不但拒絕接受党分配的工作，还大量地散布了反党的言論，积极主張抗日必須統一服从国民党。反对党办教导队、办小报，認為党这样作是标新立异，不統一于国民党，不利于抗战。这样他就被党清洗出去。此后，姚雪垠就一面打着“进步文化人”的招牌，連續写出了“戎馬恋”、“春暖花

开的时候”等低級色情的“作品”，在抗日的外衣下，販賣色情毒素，以麻痹青年人的抗敌意志。一面他又与文化特务头子張道藩勾勾搭搭，并与文化特务陈紀瑩合編刊物“微波”，与另一文化特务孙陵保存着“极其温暖的友情”（陈与孙現都在台湾）。1948年上海解放前夕，姚竟与叛党分子張松和、石小萍以及一些国民党特务分子等糾集在一起，組織偽地下組織“中共中央华东局江南工作委員會”，由姚担任所謂“宣傳部長”，在上海解放前夕，进行了一次駭人听闻的大規模的政治投机活动。上海解放后，即被取締。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姚雪垠对国民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直到解放八年后的今天，还念念不忘，今年6月，他在“旅行家”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蘆沟桥的礼贊”的文章中，竟丧心病狂地对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进行肉麻的歌頌。說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毕竟是主張抗战的，所以他在人民中間的声望、威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

由此可見，姚雪垠在政治上，是一个一貫投机、反动的野心分子，在文学上，也是一个販賣資產階級庸俗的頹廢的艺术观点的作家。

正当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在那里兴风作浪，反党气焰不可一世的时候，“人民日报”自6月8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起，連續地发布了社論，向全国忍无可忍的人民，发起了反击資產階級右派的战斗号召。这时候，姚雪垠还繼續支持儲安平的反論，并向彭子岡秘密献策，要彭子岡“把意見委婉地提向周总理”。企图为儲安平等的罪行进行开脫；同时，他还到处散布誣蔑反右派斗争的言論，說什么“目前斗争較复杂”，“社会反映也不一致”，“不仅党外人士思想不一致，有些老黨員也如此”，企图混淆視听。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写信“批評”姜弘“容易忘掉原

則”；并急急拿出所謂“反右派”的小說，去找“人民文學”的負責人，要求发表，爭取主动退却。

在作协武汉分会召开的几次辯論会上，姚雪垠使出了各种花招，对他的反动言行进行了百般地抵賴和狡辯，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憤怒。并对他一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了充分的揭发和批判。在大量的事实和充分的駁斥下，姚不得不开始交代自己的問題。現在，摆在右派分子姚雪垠面前的，是两条道路，究竟是彻底向人民繳械投降，以爭取人民的寬恕，还是繼續坚持反动立場，进行頑强狡辯，而自絕于人民？何去何从，需要姚雪垠自己选择。

（原載1957年10月号“长江文艺”）

反党的“通才”

——記长江日报反党联盟的首腦楊江柱

燃燒就是酸化，而因为腐爛也是酸化，所以許多腐爛着的人以为他們是在燃燒着明亮而鮮艳的火呢！

——高尔基：“再論机械的公民”

在我們身旁也有这么一小撮人，他們正在腐爛，但他們却以为自己在燃燒、发光。正当全国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时候，报社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特別活跃的年輕人物。他說：“我宁愿燃起一把火把自己燒掉，也不愿只冒烟，不燃燒！”这个人物，就是自吹已經“一通百通”，达到了郭沫若那样“通才”“境界”的經濟部編輯楊江柱。这个一贯坚持反革命階級立場的階級异己分子，阴谋組織反党联盟，自己充当首領，凶恶地向党进攻，到鳴放期間，他是更加瘋狂了。

(一) 日夜点鬼火，猖狂大进攻

楊江柱是經常分析形势的。上海、北京开展大鳴大放后，他喜得头脑发昏，認為这是天下大乱的前夕，党已經极端困难、被动，他混水摸魚的日子到了。这时，他除了策动和支持他的反党联盟，进行了有綱領、有計劃、有策略、有分工的反党活动以外，在报社开展鳴放的重要关头，还亲自出馬，广泛地煽动群众，他要这个人談报社的“内部矛盾”，說那个人发言还不够尖銳，是“怕不能入党”。对一个工作上有些意見的非党干

部，接連四天抓住不放，甚至把別人拉到他家里去談，問人家是不是“有職有權”。他說：“你原來就不是這個個性，有什麼都通（講）出來的人，今天怎麼變得這樣了！”等到人家談出了自己對工作上的一些意見之後，他就故作驚訝：“哎呀，想不到你還有這麼多意見！”一定要別人到大會上講。到第四天，看到這個幹部還在考慮，他竟然迫不及待，不管別人是否同意，就硬替別人往大會上遞條子，說別人要求發言。就這樣，僅從5月中旬到6月底的一個半月時間內，他利用上下班、上廁所、走路、會議休息時間、串門、請吃飯以至工作時間的一切機會，使用了各種手法，直接煽動的群眾，初步查明即達三十六人，遍及編輯部的各個角落。

就這樣，在群眾對黨積極善意提意見的同時，楊江柱和其他別有用心分子，向黨策動了一場猖狂的大進攻。他主張將黨報改辦成為資產階級的同仁報，說辦一個象文匯報那樣的報紙（指資產階級方向時期的）才“大有搞頭”。他叫囂要大大砍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宣傳，並且不止一次地在“干預生活”的口號下，主張多登“他為什麼瘋了”這類的社會新聞，多揭露社會的陰暗面。他還贊同不由黨委委派編委而由職工同仁選舉編委，贊成效仿資產階級的民主，不由領導調配幹部，而是“自由組閣”。他還和他的反黨伙伴們，得意忘形地醞釀了選編委的名單。他還和他的反黨伙伴對歷次政治運動進行反攻倒算，他甚至猖狂到向來報社的省委書記王任重同志質問，要報社向肅反中斗錯了的人（指他和他的反黨伙伴中被斗了的——其實並沒有斗錯）賠禮！

在那一段烏雲亂翻的日子裡，他興高采烈地向他的黨羽說：“這才象鬥爭”，並且洋洋得意，連走路都輕飄飄地，擺起八字步來了。

(二) “杀人如草不聞声”的毒箭

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忽然有个人会从你背后輕輕走来，輕声諂笑地問：“你最近看些什么書？”他或者还会非常“关心”地問你：“最近写了些什么稿子？得了多少稿费？”这个人就是楊江柱。这时，同志，你切莫要被这些甜言蜜語弄昏了头，相反地你要立刻警惕起来——楊江柱在向你放他的“业余兴趣論”的毒箭了。

“业余兴趣論”这个“理論”，是楊江柱在感到鑽进党内来已經无望而对党更加仇恨的情况下，提出并逐步发展起来的。首先，他打着“业余研究”的招牌，但有时甚至白天都不工作，躲在家里干自己的私活——抄書、写文章、四处投稿。他无耻地說：“我总要搞，管你是睡着的馬列主义也好，醒着的馬列主义也好……出了名就是馬列主义。”說写新聞只有“一天的生命”。他甚至更无耻地吹嘘拜金主义，說“沒有一种商品，能够出卖几次，只有写的文章才能拿几次稿费，这等于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質的商品”。

接着，他就用了許多办法来販賣他的“业余兴趣論”。他对許多人吹嘘說他在某某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得了多少稿费，并且拉着別人去參觀他用稿费买的書柜和收音机，看他給爱人买的花衣服，用名利引誘某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而对有的人他就更露骨地煽动怠工，并且代出主意，如鼓励采访商业的記者写章回小說，还给处理群众来信的同志安排题目去研究历史。对有些人，他还从生活上感情上先拉攏，然后再从思想上进行腐蝕。他抓住有个同志爱喝酒的弱点，就先后十来次找这个同志談喝酒。經過三次喝酒談話之后，据这个同志揭发時說，以后对楊江柱的看法就慢慢地改变了，認为他还不错，“平易近

人”，也有“本事”，并从感情上逐漸和他接近起来。接着，楊江柱就开始向这个同志散布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見了面总是說这个同志的工作崗位真好，将来可以成为“专家”。并且还装着很关心的样子說道：“你最近写了多少‘时事講話’？你的笔名是什么？每个月可以拿多少稿费？”在他的唆使下，許多人受毒了。有的人已公开向領導上承認自己“有一套研究計劃”，因而“在工作上放松了，不主动了”，有个女同志受到他的煽动后，甚至对自己的爱人发脾气說：“你連楊江柱十分之一都不如”。前面所說的那位愛喝点酒的同志，也是受毒的一个。以前，他認為應該一切为報紙的版面服务，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版面上，业务学习和研究也應該服从版面工作的需要。自从听过楊江柱的話煽起了名利之火以后，他的主張改变了，要个人进行专题研究，不同意把人力集中在版面业务上了。楊江柱这种思想放毒行为，从政治上腐蝕我們的干部，从組織上瓦解革命的队伍，真比明刀杀人还要厉害。这正如他自己所招供的，是“深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聞声”！

(三) “人人都是坏蛋”和韓非子的“术”

楊江柱讀过先秦諸子的典籍，并最崇拜韓非子。他沒有从我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法理学家的学說中，学习到唯物論的健康成分，却从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場接受了韓非子那种認為人类都是些自私自利的动物，对人應該講究权謀机变、講究“术”的观点，并且一直努力實踐着这些观点。他与別人談到“人生”时，就曾說“人生是可怕的，人本身就是坏蛋，对人要狠，要講权术”，“宁可我負天下人，不可讓天下人負我”。他自己招認：对人是“當場不讓步，举手不留情”。

对革命組織采取两面派的手法，楊江柱当然是不会例外的。

这从他和社外的陈××的密談中可以看出來（陈是他反党的老伙件）。陈某曾受了組織上的处分，楊江柱和陈談話时，分析了处分的三种发展前途，针对三种不同形势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党任务和策略，他教导陈說：“一是取消处分。那你就好好干一段，多改多写，等到群众印象改变时，你再搞你的。二是延长处分期，有很大可能，那你就不要象以前那样呆了，一天搞上三、二千字，磨時間嘛，既轻松，又可养好身体。三是开除团籍，那你就控告，拼着搞一回，不怕一切后果！”

至于他怎样阴險地用权术对待同志，可仍以他对陈××的談話为例子。陈对楊談到有人批評自己时，楊回答陈說：“讓他，不要同他吵鬧，有机会时狠狠搞他一下子，而且句句話以原則相見；小事情也可以提高到原則上去看；話要尽可能說得委婉，不动感情，那样，他就没办法。大家也支持你。我对我們这里一些人，就用的这个方法，很收效。”楊又对陈說：“別人給你提意見，不要表示抵触，不要去解釋，反正听不听由你。1953年批評我时，會議开到深夜，我一直作微笑状。別人以为我能接受意見。前不久我們組一个編輯批評我在外不注意群众工作，我沒作声，不几天一次會議，我即对他狠狠批評了一頓，可又不讓他感到是回敬，弄得他哑口无言。”

在使自己写文章出名的問題上，他也有一种“女坛登龙术”。他向他的伙伴說，“要动，就要动大头头，动了大头头才能使人注意！”而且，他这种想法是早在学生时代就有了的。他曾宣傳，我要写文章，要就批評魯迅，这样可以出名。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楊江柱运用反革命的策略手腕是多么熟練。他不仅有自发的反动本能，而且有自觉的思想体系。他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才子”，而是个反党的“通才”！当报社同志知道过去多年相处的楊江柱，竟是这样一個“笑里藏刀”、“暗

箭伤人”的家伙时，不禁个个毛骨悚然。

(四) 問題的關鍵在哪里？

楊江柱只不过是28岁的年輕人，为什么竟如此反动？原来，他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在国民党匪军中当过少将經理处长，又是湘潭反共救国宣傳委员会的委員，伪青年党湘潭县党部的主席，楊江柱是他父亲的“掌上明珠”，一心想中学而大学，大学而留洋，弄个“专家”“博士”的头衔好回国更高地騎在人民头上。人民革命胜利了，他的反动家庭当然要起变化。解放初期，当他知道家里按規定交軍粮、房屋被征借、兄妹紛紛投靠革命等事情以后，就激起了深切的階級仇恨。当时他給他爱人写了封长信，說“我家的經濟基础从此完全摧毁，未来的一切都得靠自己来創造。……从童年时代起，家庭的撫愛便已深切刻在我的記憶里。如今，意外的突变却趕去情感的温暖，逼得兄弟姊妹投入茫茫的人海，在遙远的异乡漂泊……爹媽都快六十。一生中，努力奋斗，好容易有了一个美滿的家庭……看了家信后，我心中万念交杂，錯乱奔騰……如今，好，死路一条，看你前进不前进！……今后，我的生活不能再象过去一样完全是一条一帆風順的旅程，它一定会充滿着种种荆棘，也許要經過許多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得到胜利。”可以看出，楊江柱对于他的地主家庭的崩潰，多么难过。他还認定了他这个反革命階級的骨子，今后不走六亿人民共同向往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而只有“充滿着荆棘”的“死路一条”。他并且要“經過許多迂回曲折的道路”取得“胜利”。这时，他已深深埋下了反党反人民的狼子野心。此后，他的封建家庭进一步被摧毁了，个人向上爬的丑梦破灭了，他包庇的反革命父亲也被逮捕镇压了，楊江柱因此就对革命更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經過肃反斗争，

查明楊江柱是一個一貫堅持敵對階級立場、破壞革命工作的階級異己分子，決定送去劳动教养。这时，他向組織上苦苦哀求，表示愿意悔改。組織上几經考虑，又采取了进一步寬大的措施，仍然留社工作，在工作上对他放手信任，充分給他以改造的机会。但楊江柱却以組織和人民的寬大为可欺，不久就变本加厉地进行了瘋狂的反党活动，这正如他在一份材料中所招認的一样：“……反映了我与新社会的对立，敌視党在共中发揮决定性的领导作用的世界。那么，我喜欢什么世界呢？那只能是艾森豪威尔的世界和蔣介石的世界。这说明我生活在党领导的世界里是感到渾身不舒服，而我在解放前却是感到‘前途似錦’，在革命政权下，当然不容許有这种‘前途’，只許誠懇地为人民服务。因此，才会感到沒有‘前途’。全部关键是在这里。”

(五) 否定之否定

偉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一切拥护党和社会主義的人們都在党的领导下，对右派分子奇起反击。鳴放中一时神气活現的魍魅魍魎顛抖了，但楊江柱仍在耍新的花招。他起先还装着若无其事，并对整风办公室的同志說，別人“好象是个右派”，企图轉移党和群众的視線。群众的大字报和漫画憤怒地出現了，許多人在大小會議上进行揭露和提出質問，并警告他是滑不过去的。这时楊江柱才避重就輕，被迫承認自己只想对肅反結論和“业余兴趣論”的批判翻案。但是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擦亮了眼睛，在接連四天的全社大会上，大家一个接一个地踊跃起来发言，受到他煽动的人，起来揭发了他到处点火的活動。熟悉他学习根底的人，用他剽窃抄襲別人劳动成果的事实揭穿了他美丽的外衣——才华。和他多年相处的群众，从各方面揭发和批駁了他一貫反党反人民的活動和丑惡的精神面貌。有的人

憤慨地說：“想不到和我們朝夕共事，我們也把他当着忠实的革命同志看待的楊江柱竟是这样一個陰險的傢伙！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就会背着我們偷偷地放出一支冷箭，把我們當中的那一個射傷的，我們絕不能有右傾思想。”有的人更尖銳地分析了他篡奪報社黨的領導權的目的，指出他“是為了奪取報紙這一個階級鬥爭的武器，以便向黨和六億人民更瘋狂地進攻，鼓後達到資本主義復辟。”還有人更憤怒地警告楊江柱：“你們不要白天做夢，你們不妨試試看，你們到印刷廠去談談你們的復辟計劃看，工人同志們不請你們的腦袋吃老虎鉗子、吃鉛條才怪哩！”“不管你是‘一直作微笑狀’也好，是眼淚戰術也好，我們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在群眾的強大威力下，他的反黨聯盟的成員也被分化瓦解，紛紛起來交代和揭發了他在背後的惡毒言行。於是，楊江柱這個反黨聯盟的魁首的丑惡面目，完全暴露在群眾面前，象一只撲了火的燈蛾，只剩下一絲絲黑煙。這一次他在群眾中，真的搞臭了！

（原載1957年10月12日“長江日報”）

江云反党集团土崩瓦解纪实

湖北人民出版社反右派斗争继续深入开展，追查出以江云（该社副总编辑兼文艺编辑室主任、党员）为首右派小集团，又揪出一批隐蔽着的右派分子，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包括有文艺组正副组长吴丈蜀、和穆熙，编辑陈家谔，美术组组长王居平，编辑俞元辅、胡林茂等人。自1954年以来，江云就把她所领导的文艺编辑室，作为她的“独立王国”，这次整风，他们就发展成为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集团。在群众的充分揭发和说理斗争之下，这个集团已开始土崩瓦解。

几年来江云培养了一批反党的“打手”“闯将”

江云原是中南人民文艺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中南文艺与中南人民两出版社1954年合并为湖北人民出版社后，江云升任副总编辑。她是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自高自大，目中无党，一贯对党不满，以向党“斗争”的斗争性来自夸自炫的人。自居于党的反对派的角色，江云自己是对党的方针政策与历次运动总是抱怀疑、反对的态度，借独立思考为名，发展修正主义思想，把党员群众响应执行党的号召，说是“人云亦云”“奉命正确”而大肆攻击，她主张事事以“自己的认识为是非标准”如果“党怎么说就怎么做”，她认为这就是“没有斗争性”，因而也“就是没有党性”。她以这个杜撰的“理论”来培养她的“打手”“闯将”。

詆毀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江云及其集團成員一向是對黨的政策方針黨的領導和我們國家生活、社會主義制度採取詆毀誣蔑的。江云、王居平經常說“共產黨什麼事都要包下來，我看你包不下來”，江云公然認為儲安平的“黨天下”之謬論“並無不可”，王居平更明白地說：“誰沒有宗派主義，問題在於有權無權。”他們痛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誣蔑我們國家與黨的生活中沒有民主，江云要求黨要“開禁”讓她“干預生活”，說“現在是只許歌功頌德，不許批評缺點”。她又說“現在不是婆婆媳婦的時代了”，意思是說現在是爭民主的時代。和穆熙則到處叫囂我國現行選舉制度不民主，他說現行選舉制度是保護官僚主義扼制民主的，要求改變選舉制度。他們否認民主集中制原則，提倡抗上的“鬥爭性”，反對下級服從上級。對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不如自己的意，就要“頂回去”“不管它”，要“堅持己見”展開“鬥爭”。她們對領導機關派下來的人總是稱作是“欽差大臣”、“官僚主義”，拒絕接受檢查幫助。

反對“三化方針”，要走資本主義的“同人”路綫

黨和政府給省的人民出版社規定的方針是“通俗化”、“群眾化”和“地方化”，這是貫徹為工農兵服務的出版方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大量通俗讀物，正是執行了“三化”方針所取得的成績。江云閉眼不看成績，她對這一方針恨之入骨。公開反對這一方針，說按這個方針做行不通，“出版社就得關門。陽奉陰違出版社就可以發展，這还得陽奉陰違。”她“要黨委非收回這個方針不可”，她要求省委書記以後“不要給出版社規定什麼方針”。江云及其同伙堅決反對黨和政府規定的出版方針，是

有不可告人的反动勾当。他們要走資本主义的出版道路。在整风期間，这一右派集团对出版社的体制問題很感兴趣。他們对社会主义出版体制大加攻击。叫囂“解放后工作不好办”，“挂着国家的牌子不好办事，私人办社好办事”、“老子愿意出誰的就出誰的”。他們要把文艺、美术从湖北人民出版社“拉出去”，搞成一个所謂只有十五人办社的“同人出版社”。他們在六月上旬开了一次會議，进行具体筹备工作。提出取消“三化”方針，不要方針計劃，要出什么就出什么，“要自由不受約束”。和穆熙、俞元楠，又勾結外地和本市的一些右派分子翟房风、姜弘、楊江柱等人組織“同人杂志”。刊名“野草”，宗旨是“标新立异、干預生活、提倡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是为了反对党的文艺路綫、宣揚资产階級文艺思想的。他們表面上說是“現在的刊物千篇一律，沒有个性”，为了繁荣創作，办这个同人刊物，实际上根本不是为工农兵服务，而是为个人名利。他們說“第一炮要打响，不要怕臭，‘草木篇’这样的稿子也可以登，为的是在文学史上留下几行”。这个刊物要請李蕤作顧問。江云对和穆熙加倍支持，并故意挑撥地說：“你們办得起来办不起来，就要看当地党委是不是教条主义了。”答应代向省委說項，并私下对和穆熙表示在時間上支持他（意即和可以不上班去搞他的“同仁杂志”），为他保守刊物組織上的秘密。王居平也要搞一个“同仁画室（社）”，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自己搞美术出版去，他想拆垮湖北人民出版社。此外，这一右派集团还热衷于资产階級的“文艺沙龙”，他們要定期举行沙龙茶会“交換”意見。这个右派集团企图篡夺領導、篡改方向，与党所領導的文化事业相抗衡。

否定三反肅反运动，攻击人事制度

这个集团在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上一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对过去党领导进行的三大改造五大运动是不滿的，他們异口同声的攻击党。江云說三反五反的結果“只是死了一批人，造成党群隔閡”；“肃反运动在具体单位內成績不一定是主要的，而錯誤倒是主要的”，这样全盘否定运动的偉大成績。在鳴放大会上，右派分子胡林茂說“共产党的肃反运动是把宪法当成狗屁”；江云公开为胡风翻案，为流沙河辯护，誣蔑党的思想基础唯物辯証法为“江湖术”，“怎么說都是你共产党有理”。她就这样墮落成为一个恶毒的反党分子，对党的一切加以誹謗歪曲，把党的領導說是昏庸无能，独攬大权的統治集团，并把党的領導与下层干部对立起来，企图挑撥起一种反領導的情緒。在社內她也是在共小集团中竭力吹嘘自己如何正确，別的社的領導人如何不行。和穆熙、俞元輔还攻击人事制度，和穆熙說“人事档案是干部的包袱”。他又主張“党的領導只要有方針政策就行，不必都用党員来担任領導”。

宣揚“一本書主义”販賣反馬克思主义私貨

江云在出版社內要把她所領導的文艺編輯室变成“独立王国”，江云及其集团成員以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的“一本書主义”、“一幅画主义”的創作来相互鼓勵。江云曾經說过“有了作品就有前途，別的都是瞎話”。王居平說“要出一两种东西腰杆子才硬”。王居平、俞元輔經常散布“做編輯工作是做孙子，要到作者那里求爷爷告奶奶。老子去当作家去，要叫別人也到我跟前来求爷爷告奶奶”。在这样思想支配下，他們根本不可能安心于出版工作，而只能醉心于个人名利。吳丈蜀、王居平、俞元輔利用工作方便出版自己粗制濫造的作品，每年获得大量的稿費，但是他們胃口越来越大，利欲还不滿足，經常向領導爭待。

遇爭創作條件，要求實行“半日工作制”以至個人“專業化”。當出版社社務會議對江雲領導下的文藝編輯室的不良傾向表示反對，某些不合理要求未予滿足時，江雲即在其小集團周圍散布說她在社內如何孤立，說社務會議其他成員如何不重視編輯工作，王居平則故意說現在領導不懂業務，不關心美術。他們也一致反對編輯人員學習理論與業務，而片面地強調創作的重要。

這個集團反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與黨對文藝的領導，打着反教條主義、反庸俗社會學的招牌，販賣資產階級“唯美主義”、“人性論”等等私貨。江雲一貫脫離政治標準以作品有無“人情味”和所謂“藝術魅力”為衡量標準，贊許那些所謂“揭露黑暗”的其實包含着反動的思想情感的毒草。她反對批判“草木篇”，對胡風分子反動詩作認為是好詩，到處贊揚。她認為作家“完全有權利”不顧歷史真實來把愛國者寫成叛徒，只要是“合乎情理”。江雲認為講政治標準第一就是教條主義，她宣揚“寫真實”，極力鼓勵“暴露黑暗”，美其名曰反對“無沖突論”她對作品主張不問政治上的傾向，只有“藝術性”就行。和穆熙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即教條”，是“產生概念化公式化的根源”。他們提倡忠實於自己的“藝術良心”，否認世界觀和立場對作者說是根本問題這個觀點，反對思想改造，否定文藝為政治服務。

相互拉扯吹捧，小集團別有野心

江雲自湖北人民出版社成立，即時常說中南人民出版社來的同志不好相處，來製造分裂，並竭力樹立自己的個人威信，損害黨的集體領導。她經常對王居平、俞元輔等人說“你們是我的鎮山之寶，要為我爭氣，不要打我的臉”，她就這樣把幹部作為她的私產和反黨的資本。她對其小集團的人吹噓，說這個有“才華”，那個有“理想”，這個“政治水平高”，那個“編輯業務

强”，凡是党组织与群众指责批评她的小集团成员的缺点错误时，她总是百般庇护，多方解释。为了拉拢人，江云不惜牺牲党的利益，把党内几乎所有机密事情都向他的小集团泄露，他们到处打听传播国家与党的机密，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就是这样，她换取到成员对她的崇拜和吹捧。他们吹嘘江云“最不教条”，是“中国的娜斯嘉”等等。在这次整风中，这个集团就想把江云抬上去领导整个出版社。

煽动点火发起对党进攻，小集团面目完全暴露

整风开始大鸣大放，这个右派集团以为时机已到就向党发动了内应外合的进攻，江云一面在党支部内主张大字报标语可以贴到大街上去，一面亲自写通知找人谈话，召开第四编辑室的“鸣放会议”，她动员对党不满的分子说：“你可以一吐几年来的积郁”，她又出席“妇女诉苦会”，召开黑板报会议，由她的集团中的和穆熙提出黑板报“官气有余，民气不足”，江云即主张另出的大字报取名“民主墙”（后改为“呼声”）。在她的倡导示意之下，她的小集团的干将王居平、俞元辅、和穆熙则在社内传播社外某单位右派分子放火的经验，在社内张贴攻击积极分子的漫画，诬蔑社领导的标语，骂积极分子是“尊经卫道，献媚拍马，摇尾乞怜”的丑角，标语上写着“反对领导消极抵抗”企图以此扩大矛盾，煽起群众反对领导造成混乱。胡林茂利用他篡夺了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召开所谓帮助党整风的“专家会议”，在这个会上由和穆熙提出现在的社长不能领导整风，“应当滚到一边去”，由另外的人来领导，成立“监督小组”，由民主党派及群众代表来“监督”整风。胡林茂并向党支部和社的行政领导威胁说：“你们要当心，群众要闹大民主了”。陈家镛则利用他工会主席的身分，要求把当时社内为了贯彻边整边改召开的职工代表

会，变为駕凌于党組織与行政领导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与和穆熙两人煽动說：“代表会的決議党組織与行政要无条件执行”。这个右派集团就是这样企图篡夺出版社党的领导，以便混水摸魚，当时真是得意忘形，想把他們小集团的人抬居高位。和穆熙承認，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現在的社长搞下台，由江云来领导出版社。这个小集团認为省委輕視出版編輯工作，因而他們沒有社会地位。他們要挾领导要下来听他們的意見，江云叫她的小集团联名写信，由她签名。在6月初的一个晚上，由江云参加的和穆熙召集的一次會議上，他們决定上書省委，写了一个題名为“来自曠野的呼声”的文稿；說“連爭鳴也有等級之分”使他們“不能心平气和”，在这个會議上还討論了要把文艺、美术分出去，成立“同人出版社的問題”。

这个右派集团很快就开始暴露了他們的面目。不久出版社轉入反右派斗争，这时江云千方百计阻碍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她在党内強調出版社沒有右派，不必划分左中右，又为她的集团成員辯护，說他們的反党漫画标語有“积极作用”，王、和、吳都是“好干部”。但是她想把她的集团包藏起来不被发现的企图失败了。党引导群众提高了覺悟，展开对右派的坚决反击，她的集团中的俞元輔亦把集团的內幕交代出来，揭发了江云在这个集团平时如何支持指使他們过去在社内的反党言行。現在这个小集团，經過群众的层层剝皮深入追击，它的本来面目已經完全暴露出来了。

(原載1957年10月12日“湖北日报”)